



亚 | 洲 | 道 | 路

上海论坛 2012 嘉宾采访录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 在 上海论坛 2012 上，我们招募了 30 多位优秀的
复旦学生担任记者对论坛嘉宾进行采访。他们
用专业、投入和自信记录下这些智慧之声。这本采访录，
就是他们与嘉宾们交流观点、汇集智慧的结晶。」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诚挚地感谢每一位莅会嘉宾和每
一名学生记者。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与更多关心亚洲发
展的同仁们，共享思想与智慧的力量。」

2012 上海论坛学生记者名录

姓名	专业
Caspar van der Plas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车锐	新闻学院
陈丽娟	新闻学院
陈夏露	新闻学院
崔梦玲	历史学系
David Young	哲学学院
戴莉	新闻学院
Edward Allen	中国语言文学系
耿璐	中国语言文学系
龚瀛琦	新闻学院
韩沁珂	新闻学院
黄安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James Long	经济学院
Jeffrey Chen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金超逸	计算机学院
李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晓	旅游系
刘雨潇	新闻学院

2012 上海论坛学生记者名录

姓 名	专 业
刘夏雨	新闻学院
罗芬	高等教育研究所
罗云睿	新闻学院
倪佳炜	新闻学院
Patrick Shorter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秦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丘美芳	新闻学院
Tim Lu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盛婉瑜	经济学院
万虎	新闻学院
王恺	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一竹	新闻学院
王杨卡佳	新闻学院
相慧莲	新闻学院
徐盛洁	新闻学院
徐晔	新闻学院
许晓曦	经济管理试验班
严一心	中国语言文学系
阎薇	新闻学院
颜沁	新闻学院
杨博雅	新闻学院
余明智子	新闻学院
张婧易	中国语言文学系
章若瑶	新闻学院
赵玮成	新闻学院
赵雨樱	中国语言文学系
邹焱	新闻学院

目 录

- 002 Carlo Cararo 我们要为未来“贴现”
- 007 陈 健 中国将是“两重性”国家
- 010 陈向明 上海城市化要重“质”不重“量”
- 012 陈新华 在中国的地面上还有一个沙特阿拉伯等待开发
- 014 Chung-in Moon 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 016 Donald Clarke 地方政府融资债券（LGFV）的安全性存在争议
- 019 胡兆光 智能电网将助力低碳城市发展
- 022 华 民 未来十年将重新回归小平路线
- 027 黄枝连 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着眼全球、着眼时代
- 031 James Steinberg 中国应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
- 033 贾宝兰 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是个大趋势
- 036 鞠建东 未来十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期
- 039 李俊峰 重人才而非设备，重质量而非数量
- 042 李炜光 我主张财权和事权高度契合
- 045 李向阳 亚太——未来十年大国的角力场
- 049 林华生 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
- 051 林金源 中国可以示范共存共荣的道德价值观
- 054 刘绍臣 中国政府要对环境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 057 龙永图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还有一二十年
- 059 Miles Kahler 东欧国家的政治联合和合作
- 061 庞中英 强调地区主义是东亚合作的出路
- 064 Ronald R. Rindfuss 即使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会下降
- 066 Takashi Terada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中国角色
- 069 王 文 中国崛起是一个超大吨量级国家的崛起
- 074 王子冬 未来十年电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将会不断提高
- 077 Eiji Ogawa 亚洲应建立区域货币一体化单位
- 080 薛 澜 市场不完善，是对创新最大的制约
- 083 叶嘉安 生产性服务业势必会向更加成熟的方向
- 086 张礼卿 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 089 张维华 走近“智慧城市”建设
- 092 赵国通 新能源研究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 095 赵章元 本世纪中叶有可能出现生态崩溃
- 099 周启星 对环境问题的关心要上升到全民的高度
- 103 朱 民 人民币国际化走的是“创新模式”
- 107 朱淑娣 从法的角度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思考

我们要为未来“贴现”

记者：David Young、王一竹



Carlo Carraro

威尼斯大学校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小组副主席。

「亚洲的许多投资尤其在基础建设方面还并不完善。在亚洲，社会发展仍在进行中。现在贫穷问题很严重，为了解决贫穷问题，即将进行的发展可以走和欧美不同的路，机会还是有的。这部分国家的政府需要明白，面向与欧美不同经济体系的转型还是可行的，他们仍然有机会实现，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迈出发展这一步。」

记者：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亚洲选择”。关于这个议题，目前为止您有怎样的印象？

Carlo Carraro：我对此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探讨的这个议题，从经济稳定到环保问题都不再是国内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属于韩国或者中国，他们不再仅仅是地区性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全球化的情境在这些问题中处于核心位置。比如污染和财政动荡这些问题，单靠各国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能充分的扭转。我相信对于气候变化、能源、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等问题，这次论坛汇集的反馈意见至少能够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当然，接下来将面临各国间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更好的理解和合作至少是第一步。

记者：龙永图在上海论坛也做了主题演讲，他提到上海论坛和其他政府论坛的不同在于，上海论坛是由大学组织的。您也担任威尼斯大学的校长，您对此如何评价？

Carlo Carraro: 这是个非常棒的想法。例如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或者其他由独立机构组织的论坛，在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中都有。这些论坛更关注政策层面的事情，但在上海论坛，政策和良好的分析相结合，这些更深刻的学术分析来自不同领域的视角。只有大学可以提供这样的融合，大学是世界上能够取得这种结合的唯一的地方。

记者: 您的演讲中提到了您在与 IPCC 的合作中，努力创造控制气候变化的不同方式。你提到了一些缓解性和适应性的方式。从实际出发来看，能源公司在获得实际成效的同时很难将这些方式落到实处。你认为我们更该关注什么？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Carlo Carraro: 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IPCC 正努力汇总各方认识，不是为了制造新的观点。我认为 IPCC 基于全球化背景所提出的报告将是过渡性的。这里的关键词是“过渡性”，因为报告中提出的观点是需要时间的、进步性的，不能在几年内完成，要花上几十年，但从现在开始是很重要的。在各种观点中，调查和发展基于首位。我们需要核心的创新技术去控制全球的碳排放、着手开始提高能源效率。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还不够。我们有再生能源的技术，但成本高于使用传统燃料。不过近年来的进步是令人称道的，因为市场规模在扩大，从规模上说，这些技术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且使用价格大幅下降。这体现了改进的可行性。但是使这些技术能够切实应用还具备优于传统能源的基础建设。

记者: 您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作为一家工厂，我们可以生产出越来越好的电池，但供电站和基础建设成本很高。我觉得您也同意政府需要支持基础建设？

Carlo Carraro: 从管理层面也一样。比如，薄膜太阳能电池板应该在新建的房屋上被统一安装。当然，随着市场规模扩大，根据规模效应，这种措施会帮助企业发展，生产也会更高效。如果电动汽车基础建设需要使用公共投资而不是私人购买，这也能帮助新技术的发展。这些投资也指向私人 and 公家的伙伴关系，这也许将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记者: 现在我们来谈谈“钱”。我知道除了激励机制或者政府的支持，一些人仍然需要为基础建设买单。你曾说道 2050 年，基础建设会需要超过 200 亿到 250 亿美金。所以谁来为此买单？考虑到环境变化的成本，政府或是私人公司真的愿意为此掏钱吗？

Carlo Carraro: 附加成本并不多。对于公共部门，投资已经有很多了，并且无论如何都会有人投资，因为能源的需求正在增长。当然，世界人口也在增长，所以更多家庭需要消耗能源，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能源。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新的投资，比如新的发电厂和能源生产站点。关键是对这些投资进行重新引导，使它们从传统能源转向新的环境友好型能源，附加成本就没有那么高了。对于可再生能源，目前开销更大并且我们需要投资的部分是和传统能源不同的，并且我认为政府的角色需要涵盖这种区别。不是整体的能源上的开销，单针对这种区别。而且这种区别会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越来越小。

记者: 所以你认为公共部门或者政府需要为这种区别买单?

Carlo Carraro: 对。并且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结构和传统能源非常不同。例如,石油、天然气甚至部分煤都是由几家公司或是几个州控制的。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会更大众。

记者: 你曾说过,目前我们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指标在 440ppm,目标是 450ppm。你觉得这个目标现实吗?

Carlo Carraro: 正如我之前的观点,合理的目标是 450ppm 左右。如今,我们是 440ppm,会超过 450 甚至超过 500,没有办法解决。排放量每年增长 3ppm,所以在未来的三年中我们会达到 450ppm,十年里会达到 480ppm,所以确实不可能保持在 450ppm。然而有可能再下降,为了使碳排放量下降,我们需要从大气中移走二氧化碳。但是如何移走呢?这又是技术创新和改进这方面需要做的事。但是我们还没到这个程度。研究和想法有许多,有人说可以通过薄膜来吸收二氧化碳,或者用生物微粒。有几项技术在发展,但没有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技术。

记者: 在您过去的报告是这次的演讲中,您都提到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既是国际议题,也是国内议题。您也提到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能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但这些国家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资金。那么,通过怎样的方式能激励物力投入从发达国家转至到发展中国家?您觉得,为了培养这样的转变或物力投入,除了激励措施还有别的途径吗?

Carlo Carraro: 如果你有长期愿景,激励措施是目光长远的。如果的视角是短期的,那当然激励措施不是好主意。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接下来 5 到 10 年甚至 30、40、50 年都不会显示出效应的问题,所以你确实需要长远的视角和观点。这些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不是发达国家的问题。首先,世界更加连通。第二,生产因素尤其是劳动力是流动的。所以如果有些国家很难生存,在这些国家生活存在问题,那么人们只要搬走就好了。移动 5 亿或者 7 亿的人口是非常艰巨的,所以当人口移动时,发达国家甚至都不安全、不受保护。同时,不只是人口,我们也要考虑到健康和病毒问题、犯罪和战争。这些也不再是地方性的问题,它们是全球性的问题。想想看,当远在世界另一边的地方出现问题时,经济市场是怎样的、它们又如何反应,但是同时证券交易所的判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所以当我们探讨这些议题时,我们不是在说某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你需要一个长远的视角。

记者: 所以你觉得这是个教育的问题?需要让更多的领导者意识到现状?

Carlo Carraro: 不只是教育和认识,是通过调整短期利益以适应你自己的长期利益的问题。经济学家会说这是另一个“贴现率”。如果你不考虑为未来贴现,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变成真正的担忧。

记者: 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 中国不再回避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国内油价和电费都在增长, 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在环保和民生之间, 您认为该如何平衡?

Carlo Carraro: 当你提高一种商品的价格, 人们自然会不满意。这无法解决。但我相信正确的给资源定价是非常重要的。价格信号必须体现出, 像能源这样的基本商品也是珍贵的、需要保护的, 能源这类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使用它们。不要忘记世界人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史无前例的增长, 现在是七十亿, 很快就会达到九十亿, 会对地球上的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是很可能发生的, 但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合理的定价很重要。

记者: 您最近提出, 气温升高 2 度, 碳含量达到 450ppm 这个目标极难达到, 也很难达成全球性的共识。但是你也说结论不一定是消极的, 因为如果国家间协调得好, 国内政策和解决方式可以是非常有效的。你觉得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术氛围是否有利于抓住这个机会来根据气候变化调整国内政策?

Carlo Carraro: 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尤其在亚洲。亚洲的许多投资尤其在基础建设方面还并不完善。在亚洲, 社会发展仍在进行中。现在贫穷问题很严重, 为了解决贫穷问题, 即将进行的发展可以走和欧美不同的路, 机会还是有的。这部分国家的政府需要明白, 面向与欧美不同经济体系的转型还是可行的, 他们仍然有机会实现,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迈出发展这一步。他们需要建造新的发电厂、管道, 新的道路、新的基础设施, 他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考虑他们的发展道路。他们得理解这种被称作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实施起来并不比传统方式的成本高。美国、欧洲国家和大部分发达国家 40 年以前也许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技术条件不允许, 他们当时也没有必要的视角和认识, 甚至普通百姓也没有像今天一样意识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尤其在中国和韩国可以做到这一点, 印度能做的较少, 但仍有机会。

记者: 所以准确的说, 是因为东亚国家正在经历经济转型,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考虑将转型成为怎样的模式?

Carlo Carraro: 没错。

记者: 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态度? 你认为中国或者上海在未来十年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Carlo Carraro: 我觉得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角色太过防御性。他们自然试图维护他们的权益、发展路径以及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现在在国际政治中, 拥有与众不同的地位, 是防守性的, 致力于保护中国特有的发展计划。他们也需要为其他国家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和过去他们的角色相比, 中国需要更像一位领导者, 领导这些变化的进程。

因为欧洲或者美国不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或者欧美国家在这样角色中分量会比过去轻。所以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商中，中国有担任领导角色的空间。中国正在做很多，因为国内的认识非常明确。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排放效率、减少每单位产品的排放数量这些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提出了许多解决措施。但总排放量不会减少，随着 GDP 的增长反而会增加。所以总排放量在增长，但每单位产品的排放量在减少。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宣称的目标，是参照产品产量，把排放率改善到 40%，这是一次重要的努力。但还不够，因为和目前的发展部门已经确信的排放量相比，这个指标并没有更进一步。我认为在中国需要扮演怎样的领导角色这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努力。

记者：在您和其他高层官员、学者的接触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是什么？

Carlo Carraro: 应该说是国际谈判。无论是那些没有打算做出重要决定的谈判，还是需要批准研究文件或是研究结果的谈判。因为国际上的外交手腕仍然是古板的，需要漫长的讨论，有时大小国家被赋予了平等角色，需要与它们进行无效的讨论。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担任同样的角色、同样重要。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管理方式，能使担任领导角色的国家和地位重要的国家，在各国取得共识的过程中更起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些决策需要某种国际性的权威角色——当然不是所有决策，可以委托给能代表其他国家的国际性的权威方。就像中国的城市或省份都知道一些政策需要中央政府来制定。各国政府需要接受某种终极国家权力，它有权出于各国利益来做出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但不是所有情况，这是一条出路。

记者：这种想法普遍吗？

Carlo Carraro: 有对此的讨论，暂时还没有具体措施。当然，一些国家的人们不乐意接受这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迟早会实现。这和欧洲过去 30-40 年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区别，欧洲在欧盟的领导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这是类似的。这样的话，12 个、15 个、直到所有 27 个国家都会接受由一个中央政府来确定某些决策。我认为从世界范围来说，我们应该遵循同样的进程。当然，这种模式不是针对所有的事务，比如不针对经济议题，而是针对社会、军事或者环保议题，会更加有用。

中国将是“两重性”国家

记者：王一竹



陈健

复旦大学英文系毕业，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2001~2007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是要我们不要挑战美国，不要挑战现有国际体制。应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感召力、亲和力的国家。但是目前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做得还不够。」

记者：作为资深外交家，你如何评价现在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

陈健：其实不存在“大国形象的塑造”这个问题中国强大了，大国形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时候也借用这句话，但是我并不太喜欢这句话。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是要我们不要挑战美国，不要挑战现有国际体制。应对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感召力、亲和力的国家。而目前在这两方面做得都还不够。

号召力体现在我们自己的成功上，包括经济建设的成果带来的号召力，以及中国的体制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号召力。我们的价值观体系既要为全体中国人所接受，同时也要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先进的价值观体系，这样就有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同时还要有亲和力，主要体现在外交上。我们需要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各国谋取最大的共同利益。

记者：你觉得在未来10年，中国应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地位？

陈健：应该说对中国的定位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是全球第二，按照现在各方面的估计，未来十年内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从总量来说已经是一个“大块头”了，但是人均还很低，而科技水平等软实力、硬实力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所以说中国有“两重性”：既有发达国家的属性，如东南沿海地区，上海北京等城市完全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内地有些地区还相当贫困。这个“两重性”会继续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今后 10 余年还是两重性继续并存。

对于我们的发展目标，政府已经提出来了，包括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消除差距等等，如果发展目标能够实现，在今后十余年间我们就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就可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目前我们的难处在于，人家看我们是一个大国，要我们承担大国责任，而我们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弱国，大而不强，这当中的矛盾始终存在。

记者：你如何评价中国在黄岩岛事件中的外交表现？

陈健：黄岩岛事件，我们的外交处理得很好。根据历史经验，我们既要占理，又要占义。中国始终要站在国际化视野之上，寻求自身利益的制高点；同时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两者缺一不可，也是当前外交上的一个难点。

记者：在未来碳排放和环保责任的国际谈判中，你认为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陈健：我主张，中国要承担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低于发达国家的义务。我们再强调自己只是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太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最大的污染国之一、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从历史责任和人均来说，我们的确不应该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所以我们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应该如此定位，这样更容易被国际接受。

记者：联合国是另一个重要的大国角力舞台。有观点认为，联合国容易受到大国的利益驱使，你曾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如何评价这种观点？中国应该怎么做？

陈健：联合国容易受大国利益的驱使，这种观点完全没错。联合国是建立在大国一致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大国一致，取消否决权，联合国就将不复存在。所以联合国必然受大国利益驱使，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要接受。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怎么利用自己的大国利益，寻求中国这个大国的利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一致，这样我们就不是像美国那样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试图主导世界，我们就站在一个更高的道义制高点上。

记者：现在各国都很重视民间和公众外交，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是否也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陈健：民间外交最好的例子就是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遭遇的风波。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讲话，西方媒体基本没有评论，有的甚至以反对的态度来报道。但是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中，既举法国的国旗，又举中国的国旗，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民间外交的好处在于，其发表的观点影响力更大，而有的时候政府表态则往往被认为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会引起重视。

上海城市化要重“质”不重“量”

记者：戴 莉



陈向明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特聘讲座教授，美国康州三一学院都市与全球研究中心 教务长、主任，美国康州三一学院 Paul E.Reather 社会学与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 要克服城市化发展瓶颈限制，就要考虑减缓发展的速度，注重发展“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发展 」

记者：2007年2月，韩正市长提出了在上海新一轮发展中要破解例如上海如何融入全国，服务全国，建设四个中心等难题，那么经过了5年的发展，上海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和成效如何？

陈向明：就我的观点来说，要同时完全实现四个中心，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例如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我觉得上海发展航运，它的优势要大得多，而发展为金融中心，却有很多制度上的问题，如管制上的问题，比如银行业是否是真正开放的？货币是不是能够自动流通的？所以它有很多局限，不太能够一下完全到位。因而发展航运中心比发展金融中心更容易成功。

记者：后世博时代的上海面临着土地和资源等的限制，这使得上海的城市化发展已近瓶颈，对如何突破这一瓶颈以实现上海的进一步发展，您有什么建言吗？

陈向明：要克服这个瓶颈，就要考虑减缓发展的速度，注重发展“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发展。我觉得上海在创新发展、高科技研发等方面积累到一定阶之后，就应该具备了发展特色项目的条件。而这种特色发展并不是一定需要用到很多的人和土地，这也就不受土地资源的限制了。发展要找到一种新的增长点，探寻新的发展方式，和新的角度，例如虽然上海

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但同时随着人们交往的日益密切，也会带来很多的发展机会，带来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等。

记者：上海城市化转型的目标是什么？并且判断它转型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陈向明：上海城市化转型的目标可由政府来确定，而我认为这种认为的转型最终是受到局限的，因为一个城市是一个系统，是由各个分系统组成起来的，人为的力量不能完全地控制这些系统之间的关系，所以城市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很多的分子，很多细小的、多样的群体组成。因此说城市的转型的速度和方向在一方面收到城市本身发展内在规律的影响。当然大城市转型目标的设定，还是需要政府的推动。在中国城市发展中，政府在城市转型中是一种最主要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也在逐步地收到一些限制或是削弱，比如市场的作用，同时一些非政府的力量也在慢慢地发展起来，这些因素对转型都是有影响的，而这些影响有多大，要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协调。

记者：请您畅想一下上海未来十年是什么样子？

陈向明：这预测性的问题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的变化是很快的。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城市发展速度也会慢慢地放缓，它进入了一种新的稳定发展的阶段，而这种放慢的发展对城市的各个方面来说才是有利的。无论是软件的提高、幸福指数、空气环境，还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压力这些指标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城市相对来说都是相对滞后的，而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是快的，硬件的建设是快的，这些指标之间不太匹配。实际上城市是为人来建的，城市要宜居，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人们要喜欢这个城市。但如果人们在这个城市感觉越来越累，竞争越来越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健康也受到影响，那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是一个吸引人的城市呢？所以放慢发展的速度，我们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城市问题才能慢慢得到解决。

在中国的地面上还有一个沙特阿拉伯等待开发

记者：赵雨樱



陈新华

目前就职于英国石油公司 (BP) 中国公司，兼任中国欧盟商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上海市能源研究会高级顾问。

「有了利润空间，专业的节能公司就能够发展，使节能的技术和人才有用武之地」

在采访中，陈博士指出了中国能源行业现存的问题，更给出了对能源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期。当今的能源产业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要支柱。但是在化石能源的使用上，中国粗放型的模式带来了巨大浪费。业内流行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地面上还有一个沙特阿拉伯等待开发”，指的就是千千万万的煤炭锅炉和炼油厂。只要能对现有的能源模式进行适当调整，所带来的受益必然十分可观。比如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工业锅炉问题。这些烧煤的工业锅炉规模小，又没有除尘、脱硫设备，加上无人监管，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环境问题。

陈博士认为在对能源的观念上，要从过去的过分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努力提高油品的质量，稳定电力的频率和电压，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优质有效的能源。

在陈博士看来，要推动节能，关键在人才。但目前，中国各大高校都没有设立节能专业。即使有类似的环境科学专业，也主要是研究污水的处理问题，和国内急需的化石能源节能关系不大。

目前很多能源行业的一线工程师只注意维持机器的运转，而不知道怎样去节能。要让节能成为一个赚钱的产业，有了利润空间，专业的节能公司就能够发展，使节能的技术和人才有用武之地。因此陈博士曾建议清华大学率先建立节能专业，以弥补国内这一领域人才和技术的空白。

陈博士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的能源行业不会有太大变化。能源产业作为重工业，不同于 IT 行业，遵循的是守恒的热力学定律，不太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个行业的惯性很大，

只能够慢慢地逐步扭转。要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与其大力开源，不如节流，提高现有能源的利用效率。

目前，能源行业要提高效率主要有两个方面可以改进：

1. 能源的 T 级利用

我们人类需要的是电、热力、移动力，需要的温度也是从几百度到几十度不等的。我们应该把各种能源放在他们适合的位置。比如天然气发电，高温的用于发电，中温的可以提供居民住宅的供暖，低温的还可以提供给浴室、游泳池使用。我们现在即使是最高效的煤炭发电厂，也只能带到 45% 的热量利用率，其他的能量就作为废热浪费掉了。如果能够把这些能量都 T 级利用起来，就可以大大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2. 资源的循环利用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物。”能源行业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但是其中的很多都可以再次利用：太阳能电池中的镀银，催化剂中的贵金属都可以回收。甚至排放的 CO₂ 也可以成为有用的物质。石油里面也有多种物质，一个炼油厂，除了生产汽油柴油之外，也能够生产烯烃类的多种产品，食品保鲜膜，化纤等。

谈到新能源的问题，陈博士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应该多种能源并存。以石油为主，多种能源一起发展。

目前最可行的新能源是液化天然气。一立方米天然气可以代替一吨的汽油，而价格只是汽油的一半。而中国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还比较少；标准也比较落后，多个部委多头管理，卡车改装成用液化天然气后还难以办理牌照上路；为了不与人争口粮，酒精等生物燃料目前还不能大规模推广。未来若能够把树叶，秸秆等化纤物质转化为乙醇，则可以大大提高乙醇能源的利用价值；现在热议的电力汽车还没有大规模推广。同时电力汽车可靠性，安全性也是很大的问题。

谈到对未来十年中国能源行业的预期时，陈博士表示“十年前谁也没想到油价会超过 100 美元，但是当时世界以化石燃料为主，至今仍然没有改变。新能源的发展虽然会比化石能源快一些，但是基数太小，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不可能成为能源行业的主流。”

陈博士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能源行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能源产业作为重工业，不同于 IT 行业，遵循的是守恒的热力学定律，不太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个行业的惯性很大，只能够慢慢地逐步扭转。

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记者：李 颖



Chung-in Moon

韩国延世大学政治系教授

「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将会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亚洲将会是最重要的。没有亚洲，世界将无法运转。」

记者：2002 年年初，中国、韩国和日本开始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他们花了十年时间达成了一个基本协议。您认为，能够成功达成这个协议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Chung-in Moon：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内政治因素。一旦形成了自由贸易区，就必然会有“败者”和“胜者”之分。例如，韩国和日本的农民会成为其中的败者。政治问题会阻碍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自由贸易区能否实现依赖于国内的政治领导阶级。我并不担心中国会存在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政治领导非常强势。问题主要在韩国和日本方面。

记者：这三个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以及未来还存在怎样的阻碍？美国的干涉是否会成为一个负面因素？

Chung-in Moon：最艰难的仍然是韩国和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美国并不一定会成障碍。过去，它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但是现在，韩国和美国已经形成了自由贸易区，而日本将会加入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通过这些途径，美国也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我不认为美国会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这类协议。

记者：想象一下，如果东亚社区存在的话，您认为中国会在其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Chung-in Moon: 中国将会是最重要的。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不断上升。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应该拥有一个开放市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东亚社区。然而现在中国还没做好准备扮演起领导角色，因为担任领导意味着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目前看来，加速合作本身才是当务之急。

记者: 那韩国承担的角色将会是什么呢？中国和日本之间由于历史原因而存在一些误解，韩国能在其中充当调解员吗？

Chung-in Moon: 是的，如果未来中国和日本继续发生冲突，韩国会在两者间承担起协调作用。它偏向任何一边都是不明智的。韩国会努力联合日本，中国和俄罗斯。我们应该一起努力。

记者: 您能想象未来十年亚洲会变成什么样子吗？例如权利的分布和合作程度。

Chung-in Moon: 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将会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亚洲将会是最重要的。没有亚洲，世界将无法运转。

地方政府融资债券 (LGFV) 的安全性存在争议

记者: James Long



Donald Clarke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

「 中央政府并没有对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债券提供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担保。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挖掘这些债券背后的抵押类型究竟为何，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 今天我将会就您的研究结果对上海乃至中国意味着什么展开详细地讨论。作为一个学者以及一个总是在寻找有趣的论文主题的人，你是如何想到这个议题，进而开始你的研究的呢？

Donald Clarke: 研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特别在中国尤其如此。我是在去年彭博杂志的一篇讲述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文章当中想到这个题目的。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因此我和我的研究助手决定以法律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

记者: 所以在你的演讲当中，谈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债务偿还的法律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些债券如此不可靠呢？

Donald Clarke: 地方政府债券是否是一个安全的投资标的是非常富有争议的。有些人预测，即便是这些由债券融资的投资项目最终真的未能清偿，中央政府也会出手对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债券进行援助。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为地方政府债券提供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

担保。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挖掘这些债券背后的抵押类型究竟为何，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很有意思。在你的演讲当中，你提到了三种为债权人提供担保或者抵押的形式，那么现在可以预期能够让人们确信的形式是什么呢？

Donald Clarke：回顾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记事，我们发现了三种主要的偿还保障机制，第一种是地方政府承诺在地方政府债券遇到违约风险的时候对债务进行偿还。许多提供这种保障的债券发行都会明确地说明地方政府已经提供了这种形式的担保。一些地方政府会从他们的财政收入当中留出一部分来作为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债务的专项基金；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以银行账户作为抵押，在这个银行账户当中有来自提供收费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应收账款，这些应收账款基于一个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债券的建造转让协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债券提供一些更加隐蔽的承诺，声称自己总是能够从地方政府那里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程度的支持。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政府的承诺都不是一个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担保。第二种方式是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这种方式的抵押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债券发行商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担保的、市场可交易的长期土地使用权，并且根据《担保法》将这种权利作为抵押。第三种方式是由第三方主体承诺在债券发生违约风险时提供担保。这个第三方可以是从事目标项目当中获得稳定现金流的控股公司，或者，更加常见的是，一个专业的担保公司，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金融担保。

记者：您提到了政府提供的保障。既然他们（政府）承诺为债券提供担保，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风险呢？

Donald Clarke：这种担保形式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政府担保并不能为中国的法律所认可。其次，政府的承诺在现实当中也是很难强制进行的。中国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地将政府主体作为经济活动当中的他方当事人。我的文章对这些法律都进行了参考。即便是一方成功地起诉了中国的政府机构，收集证据的几率也几乎是零。很难想象一方当事人会出现在政府的办公室当中，开始搬走电脑以及其他的办公用品以满足取证的需要。简而言之，任何政府的承诺顶多只是为当下政府机构提供了一个“软担保”。然而，我们研究过的半数债券发行都仅仅提供了这种形式的担保。

记者：那么土地使用权抵押以及第三方抵押又如何呢？您认为这些担保方式的问题在哪里？

Donald Clarke: 就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担保形式而言,有些问题必须要考虑到。首先,土地很可能被高估或者被不可靠地估值。其次,土地上很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保留物。批漏的质量高低不一。第三,从法律上看,土地使用权是否可靠也是不清楚的。《城市房地产法》考虑到了(但却没有明确地陈述)地方政府提供土地使用权时可以收取费用,并且这种给付要在授权之后不久就进行。而在地方政府债券这边,这种给付必须在没有任何资金交易的情况下进行(在进行权力转移的时候,地方政府债券并没有发行),同时,金钱的给付也不能随后进行,因为从债券当中募集的资金必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记者: 我想第三方主题担保也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担保。

Donald Clarke: 并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的担保人可以是控股公司,也可以是专门做担保服务的专业担保公司。这些债券由担保主体的运营资产进行担保,这些资产在需要对债务进行偿付的时候可以依法进行转移或者处置。因此,这种情况下的裁决是针对担保公司实物信息而非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者的。对于担保公司收入来源以及资产项目构成了裁决的主体。显然,债券持有者必须尽可能对担保公司进行调查以确保他们的资产安全。如果在同一时间必须用有限的资产对许多的债权人进行支付,那么担保公司的担保就很有价值了。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些导致某些地方政府债券发生违约的金融印务也会引起其他的债券发生违约。

智能电网将助力低碳城市发展

记者：万 虎



胡兆光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首席能源专家，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动能经济专委会主任、能源信息专委会副主任。

「我们可以够到的可再生能源，和人的居住区是越来越远。很多内陆的沙漠地区可再生能源却很多，这就需要一个长距离的、跨区域的输送这些由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能。」

记者：现在，不光是学界和业界，老百姓也在关注智能电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您认为在上海发展智能电网，将给市民带来哪些好处呢？

胡兆光：我们在城市搞智能电网建设，首先要考虑智能化用电。对于城市里面的用户来说，通过这个系统，就能知道什么时候用电贵，什么时候用电便宜？少交电费嘛，每个家庭会这样想。当然，前提是实行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段电价不一样，如果晚上用电便宜，就晚上洗澡，晚上用洗衣机，晚上电饭煲打开。这样，智能电表不但会告诉居民什么时候用电便宜，而且，还能记录，你什么时候用了多少电，通过分析上个月的用电情况，就能调整下个月的安排，看是不是能够更少支付电费。

记者：上海市新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使海上风电成为上海市新能源发电的主力军。智能电网在风电发展中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胡兆光：因为用户是根据电价信息来用电的，这个电价信息是哪里来的呢？通过智能电网我们可以得到这些信息。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展风电，上海也是。如果没有人用，风电就浪费了，它也上不了网，因为电网必须保持电力供需的瞬间平衡，电力不能大量储存，它

一定要有用户。而风力一般是晚上比较大，智能电网就起作用了，它会预测一下，比方说，两个小时，或者明天，什么时间风最多，再通过价格信号告诉用户。比方说，晚上有风了，这时候电价最便宜，于是就提醒居民赶紧在这段时间用电。

所以，通过智能电网，第一能够让用户节约用电，主要是减少电费支出。第二，用户知道，在什么时候用电，能够把可再生能源吸纳上来，让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得到有效利用。下一步，还可以发展电动汽车充电，比如，晚上 10 点以后来充电，价格最便宜，因为是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电力。这样，减少了一次能源，例如煤炭的消费，城市就变干净了，也是对能源供应压力的减缓。

记者：您认为在城市低碳清洁方面，现在还有哪些可以做的？

胡兆光：再有就是现在的公交电气化。现在城市大家最关的是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PM2.5 哪里来的？最主要的就是汽车尾气排放。城市里面主要是汽车。其他的，比如说火电厂，还可以建得远一点，一般不会建在市中心，工厂也都在往外面走，城市污染主要是汽车尾气的问题。现在，电动汽车的技术什么时候能够突破我们也不知道，我觉得最现实的就是架无轨电车吧，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便宜的。如果你把城市里所有的用油的公交车，都改成无轨电车，将极大地解决汽车尾气排放的问题。

记者：现在城市的公交系统，也有使用压缩天然气的，据报道也是很清洁的。您是怎么看待无轨电车的优势呢？

胡兆光：压缩天然气动力的公交车还是有少量排放的。而使用电气，能够实现零排放，但是电力，我们要尽量用可再生能源来做。当然，有人认为，无轨电车超车不方便，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北京已经解决了。无轨电车通过长安街的时候，就是先把电杆降下来，不用搭在电线上；等过了长安街，再搭上，想要超车还是可以实现。因为，无轨电车里面还有电池的，那个电量足以支持汽车超车行驶完这段距离。在电动汽车，特别是电池技术没有大的突破的背景下，无轨电车是最便宜的，或者地铁也行，但是地铁太贵，轨道交通架在马路上空也贵，无轨电车是最便宜的。

记者：现在提及无轨电车，不少人会感觉回到了 60、70 年代，在很多城市运行的带“辫子”公交汽车。您认为这是公交系统发展的趋势吗？

胡兆光：你觉得落后，其实在欧洲很多，人家无轨电车还在跑。无轨电车是落后，还

是不落后，取决于是不是很实惠。不是说他在 50 年代以前，就是不好的。我们把他拆了，你想，如果改成用油，会给城市带来多少污染？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就觉得最现实的是无轨电车，如果将公交车全部换成最便宜的无轨电车，或者其他的轨道交通，实现城市公交电气化，对于 PM2.5 将带来最显著的下降。

记者：您在 2012 中国智能电网建设国际论坛上，提出“从周边国家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进口电力，形成跨国的智能电网”的战略构想。提出这种构想，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胡兆光：这是一个趋势。现在大家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那么在我们周围，看得到、摸得到的，差不多都开发了，也就是我们可以够到的可再生能源，和人的居住区是越来越远。打开世界地图，看见很多内陆的沙漠地区，没有人的地方，可再生能源却很多，那怎么解决呢？就需要一个长距离的、跨区域的输送这些由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能。

中国的内陆地区，内蒙古、新疆能源很丰富。如果再往周边看，俄罗斯东部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们有非产丰富的资源，人又很少，为什么不能利用呢？他们也愿意。这就是跨国联网的问题了。如果要把他们生产的电力，输到莫斯科很远，但是到中国很近，因此，就可以合作利用。现在不仅是亚洲，欧洲也是。欧洲已经考虑和非洲合作，通过联网，把非洲北部沙漠地区的太阳能和风电输送到欧洲电网，所以这是个趋势。跨区域、长距离输电是个趋势。

记者：进口电力，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些外交、地缘政治上的考虑？

胡兆光：这个和用电还是两回事。电力的生产、输送与消费是同时在瞬间完成，电力不可大规模储存。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都在他国内，比方输往欧洲的话，因为价格问题，他可以断气，储存起来没有什么损失。而如果是输电的话，是电厂建在他那里，电厂是个很大的投资，不论是中方投，还是对方投，解决了当地的 GDP，解决了当地的就业，解决了当地的税收。所以，一旦这个电厂建成以后，他希望卖给你越多，越划算。所以他不会跟你断电，在安全上，应该没有问题，只要建成了，输到我们这里应该是有保障的。所以，这一点，俄罗斯向中国输电非常积极。

记者：今年上海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的战略”，你能设想一下，未来十年，上海智能电网将是怎样的？

胡兆光：我相信，未来上海的智能电网将走在全国的前列。它会用得到更好，对解决上海的能源安全的问题，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包括减少城市污染，这个前景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未来十年将重新回归小平路线

记者：徐 晔



华 民

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长期从事国际经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研究。

「一个有助于优秀人才规模集聚的制度创新才是保证上海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关键」

记者：首先请您对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作简要分析。

华民：在全球经济可能已经进入最底部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危机可能刚刚开始。

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中国经济仍然维持较高增长率，但面临增长危机。危机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两位数，但2008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然而，从外部世界来看，除欧元区那些发生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之外，大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已不再下降。到2013年出口完全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作贡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提高，但消费本身的增长率也在下降，投资也在下降，特别是民间投资。最近对房地产的调控也削减了房地产投资，政府也拿不出以往那样的4万亿投资了，开始号召私人部门参与医疗、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净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都在下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衰退。

记者：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您为何认为这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危机刚刚开始？

华民：首先，危机发生后，发达工业化国家最初都选择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

的货币政策来救市，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导致本土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大公司通过全球化外包，把制造和就业机会转移到了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出现了发达工业化国家无就业复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仍然维持较高经济增长率并存的现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全球资本流动看，发达国家的特征是长期资本流入，短期资本流出，从其基本面观察已经到了底部。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刚好相反，长期资本是流出的，短期投机套利资本是流入的，目前短期资本有逐渐撤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迹象，这似乎在告诉我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刚好从在头部往下走。据此可以判断，发达经济市场国家在逐步稳健地复苏，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具体造成了哪些消极影响？

华民：我认为主要是不当的政策干预。简单地讲，结构调整、对内紧缩、对外打击出口政策都是不妥的。中国试图用政策调整来改变经济结构，但受禀赋约束，结构是刚性的，很难改变。政府希望用政策来改变结构，那就只能采取以下两大政策组合：第一是对内产业紧缩，第二是打击出口。然而，各种产业紧缩政策实施以后，受禀赋约束，产业资本开始大量离开实体经济部门，流向进入门槛较低的房地产和金融部门，从而引发了中国的地产泡沫与资产价格暴涨。为遏制出口，又进一步推行了汇率升值的做法，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都在升值。以上政策组合实施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今日困扰中国的三大泡沫：房地产泡沫、财政泡沫和由于实体经济收缩的人民币泡沫。

记者：长期以来扩大内需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您为什么认为靠内需增长是错误的？

华民：2010至2012年之间，农村的收入水平的增长率比城市高，但农民会用这些钱买东西吗？不会，农民拿去造房子，又变成了不能增加未来产出的存量资产。现在大量的钱仍在存量部门，这就造成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会因为缺少流量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增加而下降。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消费占GDP的比重都是下降的，靠内需增长是死路一条。从联合国提供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劳动者的税率是亚洲地区最高的，既然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区域下降的，那么指望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计划最终是要落空的。

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的。最近几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速

度是很快的，但是民营企业的工资总额却基本不变，这种结构性问题表明，当工资总额增长时，民营经济部门则采取了减员、甚至歇业的做法，从而出现了民营经济部门工资率上升情况下工资总额不变的相悖现象。其中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民营经济部门大都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受到市场价格竞争的约束，只要工资成本提高了，就只有采取减员或者歇业的应对策略。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在民营经济部门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全国工资总额的增加意味着国有部门和公务员的工资在增长。国有部门的工资之所以可以持续增加，就是因为它们大都处于垄断地位，管理层与一般员工的工资上涨可以借助价格转移来消化，这也就是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为何会持续提高的原因所在。

有许多人把中国内需不足归因于收入分配不公，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内需不足除了与中国当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之外（中国尚未进入罗斯托所说的群众大规模消费的经济发展阶段），还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由于税负高，所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偏低，第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居民被迫进行预防性储蓄，第三，由于社会教育发展滞后，特别是职业教育非常落后，一般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工资上涨缺乏空间。进一步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确较大，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大部分人相对贫困的根源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而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即机会不均等。因此，中国要创造内需，要增加经济增长，首先要给予所有人公平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公平收入分配，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记者：04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资本积累推动了制造业增长，而劳动力因素对服务业增长发挥了更大作用。但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外部因素还是政策因素造成的？

华民：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投资的收益率这么低，有以下原因：第一，国有替代了民营，国进民退，所以资源配置从民营部门流入国有经济部门，这种生产体制上的逆向替代是导致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开发西部也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市场环境要差很多，从而降低了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第三，政府推出的产业规划大都是逆市场的，从而剥夺了企业家的市场选择和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而这又会降低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第四，最近几年来，我们试图用内贸替代外贸来维持可持续的增长，其结果是牺牲了比较优势，学习效应也没有了，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记者：2008年政府应对危机的财政扩张政策以及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政策，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强烈的挤出效应，民间高利贷的产生与此相关。那么能否说这几年的

改革我们存在着逆市场化之嫌？

华民：政府加强管制必定会限制市场力量作用的空间。如果政府有关部门再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市场投资，那么就会进一步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政府要进入市场参与经济活动，势必会导致税收的增加，并且还会与市场主体争夺有限的信贷资源，于是全社会（包括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在内）的平均利率就会趋于上升，那些急需资金周转的民间企业就会铤而走险，进入高利贷市场融资。当政府不是选择退出，并对高度管制的、具有二元特征的金融体系加以改革，反而选择让高利贷合法化的政策，那么，全社会的金融风险就会迅速上升。所以，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由改革造成的，而是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加强管制、压制市场力量而造成的。

记者：针对现在的经济下滑风险，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您对我们的政府及民营企业，有哪些好的建议？

华民：从政府角度来讲，必须变目前的产业紧缩政策为产业扩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从存量的房地产和其他资产部门重新流向流量的实业部门，以便达到紧缩泡沫，增加有效供给和就业的目标，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企业角度来讲，绝对不要参与高利贷金融活动，尽可能降低金融杠杆，脚踏实地做实业。只有当实体经济夯实后，经济才有平稳增长的可能。

记者：对上海发展政策的建议中，您提出上海应该恢复冒险的城市精神，上海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走创新之路。那么上海的创新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哪些是最核心的？

华民：作为都市经济，上海的土地和基础设施等资源总是有限的，无法通过物质性的投资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上海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知识要素的驱动，前者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后者需要政府增加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因此，上海未来的经济增长之路首先是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要从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变为支持者和服务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创新。为此，上海就需要有能够引领经济走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理念，推进文化创新，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和敢于创业的冒险精神。同时，配合以政府放松管制的政策调整。在所有这些改革与调整中，最关键的是要看上海能否造就一个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规模集聚的平台。一个有助于优秀人才规模集聚的制度创新才是保证上海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关键。

记者：如您所说，上海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起一种以市场为导向，尊重知识、人才、

人民首创精神的可持续增长模式。那么，为实现这种模式，您认为政府应怎样做？

华民 第一，放松政府管制，给出市场空间。当前外贸市场准入门槛很高，对内政府垄断，这些都需要依靠改革来加以放松。对外来讲，降低关税，市场准入。对内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所有产业，包括高铁、医疗、银行等，回到 70 年代改革的初衷。第二，降低开业成本，允许和鼓励更多的公民进入市场创办自己的企业。第三，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确保一切拥有知识的人都可以通过发明创造而获得应有的回报。第四，控制房价，降低税收、以便让外来优秀人才可以在安居支出上降低费用，在创新回报上提高收益率。当前房价限购政策松动，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目前中央政府没有调控信号，但取消调控则泡沫会变得无比巨大，现在一定要熬过去。第五，发展教育，提高存量人口的素质，增加流量知识的供给。最重要的是学习德国开展技术教育。发展技术教育的关键是建立上岗证书制度，就像驾车必须考驾照一样，否则是没有人会支付成本去接受技术教育的。当前大学生相对过剩，社会缺乏中等技术人才，因此发展中等以上的技术职业教育是当务之急。最合理的模式是义务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与技术有关的教育作为半公共品，立法规定执照制，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投资；高等教育设立竞争机制。

记者 本次上海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的战略”。最后，请您畅想一下未来十年的中国。

华民 我的畅想就是重新回归小平路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是硬道理。

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着眼全球、着眼时代

记者：闫 薇



黄枝连

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近年来以“跨越学科，跨越文化，跨越时空”的大取向，对中国和亚太地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大计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有关文章和专著。

「上海需要的是产业转型、发展模式以及生活模式的更新换代；引进优化发展－优质社会－学习型城市的理念。要更加注重人的生活质素的开发开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记者：您参加的分论坛的主题是“东亚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应之道”，您认为东亚生态文明建设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黄枝连：人类文明与文明交流的现实与前景，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我们对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及实践。

所谓“西方模式”，其特点是把人类的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由少数群体、少数国家和地区、少数行业做集中的控制和使用。这种模式的延伸，就是西方族裔与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张，也包括人类与生物的集中性发展，例如把人从农业和农村中撤离，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及现代农业、服务业。正如今天上午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所说，中国可能还没有突破西方的发展模式、体制模式的重围。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正在形成的一个新的发展范式，但它仍处于初级阶段，如何从此出发走向“3.0模式-3.0时代”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及营运。

发展模式、社会制度以及一种文明的优劣如何，应以它同自然界的关系到否能相互促进来看，在向“3.0模式-3.0时代”的过渡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生物物种的繁衍、发展与人类物种的发展，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和更加严峻的挑战，而生物生态-生物资源及“生

物多样性”的地位，也更加突出。如果社会发展的“2.0 模式”仍被延续，那么这种“消灭性”的改变也将继续，并将对社会“五理系统”（由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所组合而成的系统）中的生物 - 生理 - 物理这一环节，造成直接的损害。

记者：在您看来，尤其是在全球化下，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东亚 2.0 模式”，是否有一个“谁为其主体”的问题呢？

黄枝连：首先，谈论发展模式，我们不可能单独地论述生态问题。以往政治或经济领域成就显著的“东亚 2.0 模式”，对生态文明、对环境的冲击性却也是最大的，这种冲击的结果是好是坏，我们至今仍无法定论。“2.0 模式”毕竟以其科学技术，为城市、人类生活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和好处。然而，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往往无法兼得，但两者也并非彼此消彼长的关系。既然“文明”是在差异性的碰撞中寻找出路和取得成果，那么在由“2.0 模式”向“3.0 模式”的过渡中，无论是东亚还是全球范围，最重要的都是要意识到转变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次，我们更不能单独论述东亚，东亚各国中日本属于“头脑清醒者”，因为在“2.0 模式”中，它的生态环境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现今它也在力图尝试新的发展并投入更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着眼于全球，着眼于时代。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 2010 年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文件中提出了五项保护措施，包括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实施能力、资金投入和国际交流合作，那么在走向“3.0 模式”的路上，您认为最重要和紧迫的举措是什么？

黄枝连：这个“行动计划”如果能够落实，是值得赞赏的。实质上“3.0 模式”并没有确定具体的重要的行为模式和评估标准，估计至少要 30 到 50 年后，它才能成型。我非常不赞同“中国崛起”的说法，中国可以平稳地发展，并不需要畸形的快速增长或者长生不老。现在，世界各国已然明白，仅用 GDP 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是十分片面的。很多国家，包括印度也正力图寻找崭新的发展模式。当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1.0”和“2.0”模式完全抛弃掉，而理应是有所抉择，甚至重新收回。

举例来说，2003 年我曾在央视四套的《海峡两岸》节目访谈中提到对“新三农”的开发问题，我认为在中国的“三农模式”中，可以有“1.0”，“2.0”以致于“3.0”的东西，并存共融，可以利用信息科技和 GPS 系统等各种手段，建设新农村、打造新农业、培养新农民。想要实现这些生物多样化 - 产业多样化 - 景区多样化 - 社区多样化的规划，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和公众都要意识到，我们需要“走向 3.0”。与此同时，政府的智慧和领导，以及政策和法律上必要的举措对开创新局面，是大有可为的，同样紧迫的还需要高等院校开设与

产业文明 - 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建设相关的系统性课程，为其贡献人才力量。总之，正如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在发展范式上，没有必要纠缠姓“社”或是姓“资”，即没有必要执着或否定“1.0”和“2.0”，而是要通过“跨越时空 - 跨越产业 - 跨越文化”的理论及方法论来跨越它们，实现“探索 3.0 模式 - 走向 3.0 时代”。

记者：上海世博会上的五大主题馆中的“城市地球馆”生动展现了城市扩张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您认为上海在“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上表现如何？

黄枝连：上海的发展，有如中国的发展，更多的仍是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等少数产业的发展，仍处于“2.0 模式”的“炒作”中；并未挣脱近现代西方文明的“2.0 模式”。这几天，我们在上海市区活动，车水马龙，水塞不通；其嘈杂混乱的情况，同我们四月初在马来西亚大城市的感受，如出一辙。上海的挑战是，亟需意识到应该“走出 2.0，走向 3.0”。在清晰的意识下，上海需要的是产业转型、发展模式以及生活模式的更新换代；引进优化发展 - 优质社会 - 学习型城市的理念。因为现今的发展，不是再通过盖高楼、建大商场，修新马路等来彰显其成就；而是要更加注重人的生活质素的开发开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记者：据悉，黄教授您在“上海论坛”的交流中，对中国内地正在推广的“廉租房建设”计划有所思考，可否把它与“优质发展 - 持续发展 - 人类文明 - 东西文明”交流中的“3.0 模式”相联系分析，探索它在文明社会 - 生态文明的建设中，能够 - 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黄枝连：现在中国政府为了扼制房地产炒作和过度的集中发展趋势，大力出资建设廉租房，可以说这是香港和新加坡“公屋模式”的衍生体，在港澳地区，它被称为“屋村”。日后，中国内地每年将有成百上千万套楼群建成，若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十几年后中国便可能有接近五至四分之一的人口住进“屋村”中，在“社会情境 - 社会环境 - 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它的影响非同小可。所以，如果它被建成了简易房，硬件和软件的配备和设施都“滥竽充数”，那么将可能成为“新贫民窟”，这不仅会引发犯罪率的升高，甚至会引发冲突、暴动及政治抗争，也很可能成为社会文明 - 生态文明一体化、国家人民长治久安的宜居场所，甚至是文明的摇篮。

不仅是上海，全国各地都需要从生物多样性、社会环境 - 生态文明 - 优化生活的角度来建设发展整个城市。它需要“产官学 - 老中青”共同探索，这一如何建设“新屋村 - 新社区”的大课题，便是对建设崭新的“3.0 模式”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

具体来说,“新屋村-新社区”的生态文明,可以分四个层面来开发开展,即从“天台-走廊-地面-地下”来规划和建设及营运四个绿色平台,根据不同地域的气候特点等,来确定每个层次可以培养和种植生物,保护与保育并行,亦可利用周启星教授提到的“生态修补”来重新培育已经灭绝或可能消失的品种,日久天长,可能构成一个小范围的生态系统。这给生物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恢复它们的名义和自由,更让居民-村民-市民置身其间,体验好的生活。与此同时,要把“新屋村-新社区-新生态”的建设,同施政、管治,立法、教育,研究,生活,休闲,观赏等各方面的产业互相结合,这种生产方式-发展范式的转变,自然会吸引中小企业投入到社区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并可为城市居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我们力图实现的,就是建筑与周边环境形成综合、良性互动的生态系统-生存空间,打造一个有智慧的“屋村”,一个文明的“屋村”。这是一门大学问、一项大事业、一个大未来,需要专家和高等院校学者、学生专门从事相关课题的学习、调查和研究,同时应向公众普及这样的发展观和理念,要让市民了解屋村投入的必要性而贡献其力量,让他们觉得“居者自建-用者自付”的必要性,如此长期和庞大的投入,需要市民的大力参与和长期承担,比如交租纳税、主动提供建议和建言、沟通和监督。这就相当于“政府给市民提供机会,市民也给政府提供机会”,同时为公共治理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中国应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

记者：卢望哲、陈杰、王杨卡佳



James B. Steinberg

现任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院长，社会科学、国际关系、法学教授。2008年12月被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任命为常务副国务卿、首席助手，直到2011年7月。1973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78年获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2001~2005年，任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

「中国想要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就必须开始“生产”公共产品，需要表明自己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

记者：在副国务卿的任期内(2008.12~2011.7)，你自己认为对中美关系所作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James B. Steinberg：最大贡献是，我们在第一年避免了中美关系中的怪圈：新总统上台后第一年中美关系总是很糟糕。

我曾为克林顿总统工作过。总统在竞选期间，为了政治需要，说了一些对中国比较尖刻的话，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开头非常糟糕，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使它回到正轨。因此，我最引以为傲的是，我的任期内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一年的中美关系可谓历史上最好的第一年。

记者：在处理中国事务时，你最感挫败的又是什么？

James B. Steinberg：中国人强调“求同存异”，问题是，如果总把“异”放在一边，它就会不断恶化。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针对“异”进行斗争，而是我们需要在分歧点有更多的交流和交涉，以找到一种不是去弥合分歧而是去寻找解决问题途径的办法，使“异”对中

美关系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

就好像在婚姻中，如果对不同意见始终置之不理，就会在背后造成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认识到，必须对话，对烦恼着你的事情进行讨论。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中美关系中，我有些深感忧虑的问题，如外太空、核武器、互联网及海洋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有更多讨论。可能解决不了，但仍然需要更多的讨论。我希望中国同行能够理解，这不是彼此大喊大叫，而是试图找到继续前进的途径。

记者：今年是美国的换届选举之年，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吗？如果奥巴马总统连任，在对华政策上是否会延续上一任期，还是会做出调整？

James B. Steinberg：我无法替罗姆尼州长发言，但奥巴马总统在着眼于美国长远利益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对于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的承诺是清楚和一贯的。当然在一些特定议题上双方会有异议，比如汇率，但他非常清楚地反对那种 19 世纪式的、“竞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信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倡导两国是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

记者：前一段，有关美国国务院限制全美各地孔子学院教师签证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是否如一些媒体所言，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软实力传播的手段？

James B. Steinberg：首先我要说，我是孔子学院的坚定支持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其次，我对于美国国务院的决策过程并不清楚，一定要猜测的话，我会说这应该纯粹是个技术问题。

记者：刚才提到了软实力，你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有什么建议？

James B. Steinberg：我认为软实力的重点在于增加公共产品，证明你获得地位不只是为自身谋利益，也是为了提升别人的利益。

所以如果中国想要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就必须开始“生产”公共产品，需要表明自己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中国如果希望被接纳为全球强国，就必须说服大家：你有意愿来扮演“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是个大趋势

记者：刘 晓



贾宝兰

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由于行政主导，制约了人才作用的发挥与人才的培养。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现在缺少的是人才。」

记者：谈谈您在论坛上发言的“中国文化体制转型的若干问题”这一论题吧？

贾宝兰：关于这个主题，可能大家一般都不是特别了解，首先关于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大家就难说清楚。文化产业的概念是二十世纪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英语为 Culture Industry，直译为文化工业，但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各个国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在这一定义下包括的产品传媒有卡通、影视、娱乐、游戏、旅游、教育、网络及信息服务、音乐、戏剧、艺术博物馆等都属于文化产业。

在2003年9月，我国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这里是指广义的文化。主要有三种类型：意识生产与销售文化产品的行业，比如生产与销售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制品等行业；二是以劳务形式出现的服务行业，比如戏剧舞蹈的演出、体育、娱乐、策划、经纪业等；三是向其他商品和行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业，比如装潢、装饰、形象设计、文化旅游等。2000年10月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

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里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并把文化产业纳入市场化建设与管理的轨道。这里，文化体制转型成为以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这之后，文化单位开始了由事业化管理向企业化管理转型的过程。真正启动的时间是 2003 年。目前为止，我国的文化体制转型已经大体完成，但基本是政府主导型，自上而下的转型。

去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未来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对发展文化产业提出了一系列的目标方向。这个决议与十五届五中全会不同的是，发展文化产业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提下提出的，同时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发展瓶颈的情况下，寻求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里这个决议里，很具体的提出了文化产业的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明确了文化产业其内容包括文化艺术及相关产品及其服务，服务里面包括娱乐业。

记者：您怎样看待文化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文化产业现今的状况呢？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

贾宝兰：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是个大趋势，是迟早的事情。在工业化时代，文化的产业化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只是，我觉得有些因素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的重视，那么它们就会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的问题。比如：

一是体制性障碍。即二元管理模式。虽然文化事业单位已经转企，但从思维模式到管理模式并没有真正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管理。典型的是行政化管理，行政管理人员主导企业，而不是专家主导。这在企业的运作上必然与市场存在一定的反差，甚至制约企业的发展。

二是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滞后。以出版业为例。朱镕基时代修改制定的《出版管理条例》在转轨后的今年才重新修订，但修订后的出版管理条例与当今的文化产业化的需要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我们对市场的开放还仅仅限于发行业。其实，许多的“工作室”早已以合作的方式和出版社合作，并且有些工作室出的书相当不错。

记者：关于中国体制改革的问题还存在哪些问题？

贾宝兰：缺少人才与人才培养机制。由于行政主导，制约了人才作用的发挥与人才的培养。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现在缺少的是人才。

另外由于现在的考评机制多侧重于数量，加上对知识产品的不重视，我这里主要是指对知识产品的报酬十分低，加上整个社会的浮躁，因此，多数知识产品知识含量低，大量重

复，缺少原创。尤其在出版。过去经常说的“十年磨一剑”已经不多见。

再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但相应的股权问题没有解决。至少没有从法律上没有予以解决。这也是法律制度落后于转企的一个例子。所以，有时和圈内的朋友聊天，我说对“国退民进”我是有看法的。不是不应该，而是应该怎样“国退民进”的问题没有解决。事业单位原来也是国家的，股份公司后就应该国家、集团和个人都有股份，享受红利，否则，全民企业最后成为一部分人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多数人的一种掠夺。

记者：您畅想的十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

贾宝兰：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除此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只要我们的制度设计的合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越好。我觉得信心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未来十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期

记者：崔梦玲



鞠建东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曾担任 IMF 研究部常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有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理论等。

「十年以后，如果我们能在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的转型上能够有更大的成功，那么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将会走向一个很健康的轨道，所以说，这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时期。」

记者：距离您提出华夏共同体理论已经十二年了，那么现在就您看来这个共同体的实现程度如何？

鞠建东：华夏共同体的建设还未开始。在十二年前，我提出这个理论是有这样一个背景：世界经济的开放有两个轨道，一个是多边开放，即 WTO，原则是对一个国家的开放政策要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展开，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区域经济合作，就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实际上，十二年前我们的国家也面临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到了 2001 年，我们国家加入了 WTO，首先选取了多边贸易开放这样的一个开放方式。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又有许多的讨论，WTO 在技术上很多的阻力，而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活跃。再度提出虽然相隔十二年，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要形成一个多极的经济格局，首先就得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一极先建立起来，这一极就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建立华夏共同体这是一个经济调整的大趋势。

记者：当前，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升级，国际社会担忧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对欧元的前景也持悲观态度。这一危机事件，给未来华夏共同体甚至是亚洲国家区域性的合作

提供了哪些前车之鉴？

鞠建东：首先，欧盟是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只不过现在欧盟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个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是相适应，比如说希腊的债券危机，尤其是现在谈论很热烈的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即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欧盟的核心国家还是在一起。许多欧盟的评论，欧盟的推进是否过快？十二年前我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欧盟成员国国家才 15 个，现在都有 27 个。对于我们国家，推进建立华夏共同体及其他的区域性的合作我们的目的非常清晰。再一个，政治方面的合作是经济合作的首要前提，也许你注意到，我提出的这个华夏共同体就不包括日本，因为如果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合作的意愿的话，再谈经济上的合作可能性不大。

记者：您在您的演讲中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当世界经济危机还在加深，在内部经济方面我们的经济转型中，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做出很大贡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中，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将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鞠建东：第一，区域上需要调整。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达到了 5000 美元，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性的不平衡。所谓结构性的不平衡，就是全国的人均 GDP 较高，但是东部人均 GDP 很高，比如说上海、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很低，所以说平均 5000 美元表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这个增长空间在各个地方是不平衡的，在今后的时期里面，在已经相当发达地区的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经济增长速度迅速降下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地增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所以结构性上还需要很大的调整。

第二，产业上也需要调整。我们本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可能会调整地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调整，而且不同地区的产业的也需要调整。在开放的新阶段一方面就是开放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在结构调整的时候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建设国内市场，建设以中国企业、中国品牌、中国规则为主导的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品牌在中国市场并不占主导地位，比如说汽车。如果向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建设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和闭关锁国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只不过从经济上这两种概念和经济的优势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进口的进口，不该进口的不进口，该保护的保护。目前我们主要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凡是有利于出口和打入世界市场的有很多的让利政策，而在今后要更多的是倾向国内市场建设。

第三，目前我们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城市和超大型城市上，中型城市几乎没有。我们今后的发展重点就是要回到县城上去，回到区域性的市场上去。开放不仅仅是对

国外的开放，也是对区域的开放，尤其是对农村和农村区域经济的开放。如果说把以上这些结构调整好了话，增长空间是很大的。

记者：请您畅想一下十年后的中国。

鞠建东：十年以后，如果我们能在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的转型上能够有更大的成功，那么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将会走向一个很健康的轨道，所以说，这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时期。但是究竟十年后会调整成什么样，我非常有信心！

重人才而非设备，重质量而非数量

记者：徐盛洁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自主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必须从培养人到机制、体制、政策等方面一起努力。」

记者： 德班气候大会去年底刚刚结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也在去年 12 月正式成立。您觉得我国要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更多成果的话，在新能源的使用方面需要做出哪些实际的举措？

李俊峰： 我们现在还需要加大一些市场的开发力度。目前我们国家产业的发展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市场还是存在些问题，需要加大市场的开发力度，否则的话很难有大的作为。现在新能源的使用比例还很低，“十一五”期间提高了一点，但是去年又下降了一些，到现在整个比例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还得要扩大市场。

记者： 外界对于气候谈判大会很关注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大国责任的问题，国际上有一些质疑、争议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我们又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李俊峰： 这个责任和义务应该要和国家的发展背景、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谈水平不谈发展阶段只谈责任这是很没有意义的。处在不同阶段就应该相应承担不同的责任，比方上小学的时候不可能承担大学生的责任，在大学的时候不可能承担研究生的责任，这个就和发展

阶段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考虑了这些再去谈国家的责任。节能减排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但是所谓“大国责任”并不是说你想承担就能承担得了的，就好比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承担一个 18 岁的男孩要去承担的事情，他是不可能做到的，再逼也没有用。其实说到责任，大国小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必须要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现状，在衡量国家能力后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才是合理的，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节能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在努力的工作，那您预计未来十年我们在此可能会达到怎样的成就？

李俊峰：我们希望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要达到 15%，但是现在看来困难很大。主要是因为各种变化因素很多，包括有经济发展问题，化石能源增长问题，还有核电、水电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到时候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 15% 的目标还有很大的悬念，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但是现在来看，未来十年不确定性实在太多，只能说尽力而为了。现在强调的是大力发展水电、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能源，安全发展核电等等，大家对此也都在规划，但是具体措施现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吧，现状还不成熟。

记者：新能源这方面，之前您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时候多次表示新能源的发展目前要强调自主创新的问题，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新能源的发展怎么样了，在自主创新方面有突破点了吗？

李俊峰：自主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必须从培养人到机制、体制、政策等方面一起努力。目前我们国家的研发体制和创新的要求是极其不适应的，这个需要做出很大的机制上改善，没有这个改善空谈创新毫无意义。比如相比于西方国家，我们不重视人才。同样一个科研项目，中国和美国相比，美国一个科研项目用来支持创新人工费用的大概占到 60%-70%，但我们的人工费用支持不超过 5%，其他钱多数只用来买设备，对人才的努力这么不重视何谈创新？

不重视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看得太低，把设备价值看得又太高，这是中国长期以来一个问题。我们一向在设备投入上舍得花钱，买了很多装备，建了很多大楼，但在人才上却始终没有放开。美国也好，德国也好，想想有多少中国人正在给他们打工啊，多少人高薪把中国人聘过去，但国内就没有办法来留住人才。长期坚持现状一直不改，后果实在堪忧。

记者：您觉得上海作为一个这么发达的城市，该怎么实现低碳发展呢？您有什么建议吗？

李俊峰：我三四年前在上海也谈过同一个话题，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我看来现在不用一味考虑发展的问题，而是要慢下来，要在整个环境质量、生活质量水平上和国际去接轨。我们有一批很好的大学，比如复旦大学，我们的大楼不比国外的差，我们的实验条件不比国外的差，但差距就在我们没有大师级的人物。上海的发展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提高、完善这些东西，从质量上而不是数量上去改善。今天我们的大学校园不需要建得更大了，我们的大楼也不需要修得更好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好地、实实在在地提高生活质量、水平，这样的思路或许比计较我国 GDP 又涨了多少来得更重要。

这虽然是一个长远的工作。但一定要先有一个紧迫感，必须有寻求改变的想法！刚才我说的不尊重人才、创新机制落后的问题如果仅仅靠资金的投入而在体制机制上不进行根本性变化的话是解决不了的。而上海在这方面可能要先走一步，带头做出改变，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改变一时半会儿或者很难，但一个上海市可以先行动起来，我很希望看到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先带好这个头。

我主张财权和事权高度契合

记者：赵玮成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学报主编，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税法学会理事。

「税收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去除财政幻觉」

记者：这些年来，公共预算改革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那预算到底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炜光：预算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政府财政收支的一个表。这张表反映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活动的开支，但政府不是公司，不是物质生产部门，他不创造财富，所以政府的所有支出都出自税收，这就涉及到许多问题：谁承担你支出的成本？这些支出运用的资源谁受益？这些受益人之间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算？这些事超出了这张表格本身的意义，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预算的影响特别深远。

过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预算，即使有收支表的形式，那也是充满统治阶层的意志的，纳税人没有发言权，于是这一部分财政的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违背纳税人的意愿，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体制的扭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中，预算就成了一张比较敏感的表格。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是在和政府签订一个有形或者无形的契约，就是我把钱交给你，但是你要善待我，让我活得有尊严，那我就愿意交税了，逃税这种现象能够得到遏制。财政预算、税收都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反映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民主政治和传统政治的关系。民主政治是大家普遍认可可是人民养活了政府，每一分钱都是来源于人民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不存在财政幻觉财政。税收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去除财政幻觉（政府出钱支付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来养活百姓）。

记者：政府在应对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的现状如何？又该如何做呢？

李炜光：首先，政府必须做到预算安排过程的公开，下一步就是期待公民社会的成熟，当公民不再满足于你给我一个账单，而是更积极地参与到你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去，这就实现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所以财政预算本身超出了一个工具、技术的层面，而转变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的问题。要搞好预算需要政府采取更民主的手法听取民意，满足公众参与到预算编制过程中来的欲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

相比于纳税人权力意识的觉醒，中国政府有些公务员的观念落后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这种观念的转变不可操之过急。但我发现上海是一个纳税人权力觉醒的比较普遍的城市，如果要我说中国哪个城市离公民社会最近？上海超过广州排在第一位。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监督预算，才能让纳税人的权力得到最大的保障？

李炜光：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就是政府自己监督自己。例如我们常听到的审计风暴，即审计署每年对各个部委有选择性地进行的审计，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审计一般都是事后监督。第二种叫做外部监督，也就是所谓的外部的正式控制。这就好比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着人民来对政府的这个花钱过程进行监督、决策，决定。要尽量地发挥人民代表监督和控制在作用，一部份人大代表可能慢慢考虑要专职化，人大内部成立专业委员会聘请专家来进行日常的监督，这些事得慢慢推进，推进时间长了以后，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和预算的日常运作渐渐融合才能达到一体。民主、宪政、法制，这些都需要靠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运用代议制的形式把意见反映上去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有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记者：在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上，您认为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哪些主要问题？

李炜光：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向上走的，越到下级越没钱。我赞成基层政府要比中央政府占有更多可支配资源，因为政府存在的价值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而这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他和民众是零距离的。所以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要到位，财权事权实际上是责任，这需要和他支配的资源高度配合才行。比如湖南翻车，我还记得记者采访了秦岭，其实镇长很担心孩子上课很危险，地方政府打了好多年的报告最后就是修不成，最后 11 个孩子就被淹死了，他说“我们修不起，打报告没有回应。”事情一出很快修了桥，问题就解决了，这就给人一个印象：11 个孩子的生命换来了这座桥，而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

基层政府想尽责任，却没钱，所以我主张财权和事权高度契合。说实在的中央政府倒没有这么重要，有些事情你可以不做，我个人认为少造一艘军舰不要紧，相比之下儿童上

学的安全问题却是天大的事情，没有人会质疑，这比建立一支多强的军队要重要得太多，真有强大的军队也未必是强大的国家，如果一个社会建立得很和谐，大家安居乐业就不需要很强大的军队。

记者：地方政府不得不用 45% 的相对财政收入支付 75% 的相对支出，造成了很多问题，您看问题出在了哪里？

李炜光：严格地说地方政府的建设还很不到位，它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地方政府很缺乏独立性，他跟美国不一样，在美国的体制中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甚至是宪法，它可以决定自己本地的许多事情，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没这个权利，那么中央政府就需要很多的钱。而且即使是地方政府花的是中央政府给他转移支付来的钱，那也必须中央说了算，中央政府他采取的是专项资金转移支付，为什么叫专项呢？是因为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中央政府是有指令的，你不能用在别处，比如说修一条高速公路，你只能把钱用在公路上而不能用在别处，而地方政府面对着千变万化的地方上的公共服务，他就不能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这样就会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

记者：其他国家是否也经历过像中国现面临的公共财政改革的局面，它们的道路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李炜光：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税收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预算，在西方学界探讨预算首先是政治和法律的问题，这个层面上解决完了，剩下的才是管理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预算财政政府的经济不需要像私人经济一样管理得那么精细，不需要很复杂的方法，但政治上、法律上各方面要到位，一个国家基本的制度是政治权利核心的问题。美国的预算制度在现在看来是比较完备的，他除了预算的审议批准权以外，还有一个预算的拨款权。在中国预算制定以后，钱就直接拨到部门，预算单位便不管了，最多是事后审计和事中监督一下，但是美国不行，预算你已经被批准了，但你还是拿不到钱，因为还有一个预算的拨款委员会在管着你，在拨款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拨给你最合适，分成几次，每次拨多少都由它控制。除此之外，中间还要检查你使用预算的情况，据此做出调整，钱在拨的过程中预算单位是见不到钱的，它是由另外的一个结算的体系完成的，所以我们很少听到美国发生大贪污案。

当然各国各有各的国情，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成立一个预算拨款委员会，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预算之路。归根到底这都是工具、技术上的问题。预算公开是一个办法，虽然没有实行西方分权的制度，通过公开透明，也可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不是真的能做好得靠实践去说话。

亚太——未来十年大国的角力场

记者：杨博雅



李向阳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通过跟第三方开展自贸区协定，来缓解 TPP 给中国带来的排他性压力，其中最有效的一个就是中日韩自贸区」

记者：日本也在进行加入 TPP 的谈判。在您看来，日本最后谈判成功、加入 TPP 的可能性有多大？

李向阳：日本最终加入 TPP 的可能性非常大。TPP 是日本政治上的一个转向，说明日本未来对外政策转变为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但是日本经济上又离不开中国。所以日本的很多官员、学者都认为加入中日韩自贸区和加入 TPP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对日本来说，其理想状态是既加入中日韩自贸区又加入 TPP。这样一来，在同时进行的谈判中，由于目前的 TPP 由美国主导，那么可以拿“加入中日韩自贸区”作为谈判的筹码来跟美国人要价；

同时，日本人很清楚 TPP 的出现使得中国对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意愿变强，便可以反过来拿“加入 TPP”作为筹码，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跟中国提更高的要价。这是日本战略上的选择，因为要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而放弃 TPP 谈判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在日本国内，更多的人是倾向于把加入 TPP 放在优先地位上考虑。尽管可能在今年年底先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但是很难想象出现“先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再去谈 TPP”的结果，这对日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更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是先完成 TPP 谈判。

记者：现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已经有签署生效的双边自贸协议，如果日本再加入 TPP，

将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产生较大影响，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李向阳：这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在国内一大批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都在倡导要最终加入 TPP，认为即使中国现在不加入，那么将来也要加入。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没有弄清楚美国推出 TPP 条款里的动机，也就是说美国的战略目标一直被忽略了。虽然很多人不是这么一个目标，但是他们忽略了美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回归亚太”，从而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新兴大国与霸权国之间不可能靠战争来解决最终分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和平地争夺规则的制定权，显然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来争夺这个规则的制定权。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把中国纳入到其设定的规则体系之中，TPP 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即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也要打乱以中国为核心的规则体系。虽然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重起炉灶建规则”，可是客观上东盟 10+1、10+3 等自贸区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渐由中国主导制定新规则体系。这一点，体现在日本在去年决定加入 TPP 谈判的时候所表明立场上——“日本加入 TPP 意味着亚洲地区的规则制定，由中国人说了算，转化为美日来共同决定。”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应先加入 TPP，然后去“捣乱”，阻碍 TPP 谈判进程。这点美国人都已经考虑好了——要么中国接受 TPP 前提，加入 TPP；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些前提，就不让中国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没有说“进来谈判，再搅黄”的可能。所以想把 TPP “搅黄”，中国手里还没有牌。

那么到底如何应对呢？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减少 TPP 给中国带来的战略上排他性的负面冲击。中国能把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谈下来，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能说瓦解）TPP 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亚洲出现了一个“不包括中国的 TPP”和“不包括美国的中日韩自贸区”并存的局面。但出现这种情况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可能就复杂了，因为涉及到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

第二种应对 TPP 的方式是扩大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跟南亚地区的合作。国家给云南省定位的“对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云南省与孟加拉国、缅甸、印度等国开展得非常积极。至于云南省这个“桥头堡”能不能变成一个自贸区，短期内还不太可能，但是加强合作有助于给未来的制度化合作创造一个机制。再有就是在西北地区推进上合组织的经济化，这也是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俄罗斯反对。因为俄罗斯坚决反对把上合组织变成一个自贸区协定。可是客观上其他中亚国家又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有建设自贸区的诉求，所以西北地区也有发展的可能。

第三块就是东北，指的是中、蒙、俄、甚至包括朝的“次区域合作”。今年年初，图们江区域（珲春）合作示范区在国家层面已经正式认可。如果“次区域合作”能够真正开展

起来，对日本和韩国的冲击会非常大。因为一旦四国“次区域合作”顺利开展，首先便会吸引韩国资本的进入。

韩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找不到出路，加之韩朝双方在金刚山的双边合作由于没有外部的约束而经常中断。可想而知，如果韩国加入到中蒙俄朝的合作里，对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强化未来南北方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而一旦韩国进入，经济利益便会逼着日本也必须加入，所以这是中国未来有可能做活的一步棋。但是，最大的障碍仍然是俄罗斯。俄罗斯从原则上避免跟中国签署任何自贸区协定，因为它担心中国经济太强大，威胁自身的经济安全。

从以上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除去中日韩自贸区之外，还有次区域的合作可以考虑。另外还有跨区域合作，比如和海合组织、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谈判也都在进行中。总之是通过跟第三方开展自贸区协定，来缓解 TPP 给中国带来的排他性压力，其中最有效的一个就是中日韩自贸区。

记者：之前第五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达成共识，将在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您对于谈判的启动抱多大的信心？您认为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李向阳：谈判还存在不确定性。中日韩自贸区提出了十年，官产学研都已经明确地证明其经济收益非常大，之所以谈判一直不能启动，主要是非经济领域的障碍。尤其是中日之间非经济领域的障碍在近期内会不会恶化，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因素。在近期内，中日之间有钓鱼岛问题，加上在东海区域日美参与到中菲黄岩岛问题的事务中去，这些摩擦不会使中日之间在政治外交领域出现短暂的恶化，进而波及到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答案是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从大趋势上来看，宣布年内启动谈判，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至于年内能不能完成则取决于一些不可控的非经济因素。

记者：您怎样评价 TPP 目前取得的成就？它是否达到了“无例外的、综合的、高度的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李向阳：首先要注意一点，TPP 从 4 国到 9 国的转变，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其所谓的“高质量的、21 世纪的 FTA”，从它涵盖的内容来说的确是达到了。可是从它所谓的“开放地区主义”来讲，又要打折扣。因为 TPP 目前 9 个国家原有的二十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多数还将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包括原产地规则在内的众多协定还都将保留下来。而另一方面，美国需要的东西则不断地加进去。

例如竞争政策就已经从去年年底开始成为谈判的焦点。竞争政策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地位问题。再如裁决机制也是争论焦点，美国是把 NAFTA 的争端解决机制照搬到 TPP

中，NAFTA 不像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各国政府起诉，经过专家组来解决争端。在 NAFTA 中，任何一家企业或者个人都可以直接起诉政府。这很显然在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当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其他国家很难接受的，因为其中涉及到主权的让渡问题。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从 4 国到 9 国的变化实际上可以比喻为中国股市中的“借壳上市”。最终，“壳”本身的资源已经不重要，是后来借壳上市的企业它要注入新的资金、它要扩展新的业务，它要换掉它董事会的成员，名义上还是那个壳，但实际上功能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记者：就亚太区域来讲，目前存在的 APEC、10+3、10+1 等再加上 TPP，导致了一种叠加性，造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李向阳：毫无疑问这是存在的。刚才提到了，美国主导的 TPP 自身都解决不了“面条碗效应”，因为 9 国原有的二十几个双边自贸协定、原产地规则，包括一些例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保留。既然 TPP 内部的“面条碗效应”都难以消除，更别说在整个亚太区域内了。比如 APEC 里出现了双规制，即“TPP 的 APEC 成员”和“非 TPP 的 APEC 成员”。未来一旦 TPP 变成现实，由于它的自由化程度比 APEC 高得多，“TPP 的 APEC 成员”便不会关心“非 TPP 的 APEC 成员”关心的较低程度的自由化问题，最终结果就是 APEC 被架空。

至于在 TPP 出现以后，东盟 10+1 还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是目前东盟担心的问题。以前东盟通过 10+1 这种模式要成为东亚的火车头、驾驶员或者轮值国。因为东盟已经跟很多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等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所以东盟不希望这些国家再相互签署自贸协议。而一旦 TPP 模式成功，东盟原有的这种领导者、驾驶员或是轮值国地位还能不能维持，这是一个新问题。东盟有可能被边缘化，但最终结果取决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展。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取得实质性进展，可以说，东盟就将彻底被边缘化。

记者：所以说，未来十年内，无论是中日韩自贸区的发展还是整个亚太区域内自贸区的建设都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这样理解吗？

李向阳：对。亚太区域内主要大国未来的关系，可能都会因为 TPP 的出现而出现重组，尤其是中国、美国、日本这三国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几年会受到 TPP、中日韩自贸区甚至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多重影响，三方的状况决定了这种博弈的结果会非常不确定。

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

记者：Edward Allen



林华生

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华侨和华裔经济学、亚洲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中国经济在同世界各极经济具有紧密联系的同时，也具有在这个巨大方程式当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历史机遇。」

林华生教授就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发表了一篇演讲。在演讲的最后，林教授对中国如何能够在未来几年尽可能地利用这次经济危机的机遇，在世界经济的一些领域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提出了一些想法。

林教授演讲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应着当今世界经济中令人关注的四个分支领域。首先，他对美国经济的现状发表了评论。美国经济在近代经济史上曾经是最为健康和强大的经济体，但是在最近的经济危机当中，却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下滑轨道。人们把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归因于历任美国总统在超越理性的临界点上对国内消费的鼓励行为，以及最终导致美元兑日元贬值的进口文化。其次，林教授探讨了欧盟金融风暴的影响。欧洲现在深受高通胀、持续的高失业率以及各国金融赤字等棘手且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到来的时候，人们对希腊、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再次，林教授讨论了日本经济。尽管日本经济经历了被林教授称为“灰暗 20 年”的时间，但是日本却成功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同日本公司的行为密不可分。日本公司在过去几年同意认购日本政府发行的 96% 的债券。有了这个支持，尽管日本在出口以及制造业当中遭遇了明显的萎缩，其经济还是能够保证一个较小规模的贸易盈余。技术和创新的优越性带来的有条不紊的组织结构和相对自由的就业安排，为日本贸易盈余提供了基础。

这些因素使得林教授可以用一个更加全面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林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在同世界各极经济具有紧密联系的同时，也具有在这个巨大方程式当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历史机

遇。近来对外汇的认购、大体上有效的政府参与以及有管制的刺激性热钱注入都很好地弥补了中国总体上保守的投资情绪。根据林教授的数据，中国储蓄率持续位居世界之首，达到 52%。

但同时，林教授也看到，一些主要的挑战也可能给这个无形的进程带来阻碍。首当其冲的就是污染和环境问题，在林教授看来，这个问题是威胁中国经济健康的极度严重的问题。在两天的讨论进程当中，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经常会蔓延到同污染毫不相干的问题当中，而这显然也是林教授敦促任何的中国组织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这同中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直接的收入差距直接相关。

林教授也谈到了在他看来最为严峻且不言而喻的方面——地方政府所陷入的经济困境，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在逐渐减少。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没有漏洞、有组织且没有腐败的地方政府债券认购机制，才能保证成百上千的地方政府保持盈亏平衡和活力。林教授同意当天早晨一位中国环境教授的发言，那位教授对地方的管理系统以及在很多方面都靠着政府在政府的土地上做着政府主导的工作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增长究竟如何能为财产所有者带来利润，进而为更多的人带来福利表示了担忧。这反映了中国最基层对中央指令经济非常不稳定并且富有威胁性的依赖问题，同时也体现了一个非常牢靠的复杂关系，这个关系只能通过将地方经济置于债券市场和交易，以及，如林教授所言，一个有组织的国有土地对有诚信的开发商售卖——通过这个方法可以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提供保障，同时可以将这些开发商置于相互竞争的环境中从而使得经济生产可以以更加经济有效，可能也更加合乎文化风俗的模式运行——来打破。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方面，林教授对当天早晨他主持的那场论坛中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给予赞同。参与者特别强调了一个新且清晰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这是保障中国的资源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加以利用的唯一途径。基于在东亚房地产市场和生活成本领域的丰富经验，林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一些地方土地价格表示怀疑的专家，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一个更加开放的土地政策得以解决。

鉴于是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的第二天，同时也是最后一天，林教授很自然地将讨论的话题转向了教育及其同亚洲观念的关系上。他担心，在他任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20 年以后，他的研究所仍然只是同中国的大学和机构有着广泛联系，每年都有不多但却稳定数量的学习语言的学生从日本来到复旦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所之一。展望亚洲未来十年，十分有必要做出比现在更加协调睿智的努力，使得更多的亚洲学生能够在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城市学习。这是整个论坛所提出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议题，同时也是共同的决心，这不仅需要中国做出吸引来自亚洲乃至全世界优秀人才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提高日本学生愿意到中国求学的积极性——无疑这需要国际政府间的合作，就像中国学生很有意愿去日本求学一样。这种学术交流的潜力及其对亚洲 2011-2020 年真正的历史和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认同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观点象征着今年论坛的意义之所在，同时也体现了将其纳入一个全面的、具有包容性的亚洲世界所面对的挑战。

中国可以示范共存共荣的道德价值观

记者：耿 璐



林金源

淡江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美国南加大（USC）经济学博士。多年来坚持两岸统一的思想，着重研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启示，倡导勤俭节约，重视民生。

「如果在主权争议上有冲突，在军事上、外交上互相对垒，是不太可能去创造一个共同的货币的。所以，亚元区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您在论文中提到，西方的一人一票对于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会产生负面效果，您认为在台湾并不合适，那么在大陆是不是也不合适呢？

林金源：第一，我必须修正，我不是讲“台湾不适合民主”，而是说，不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年轻一辈大都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其实民主是为了解决问题，尤其是公共议题。西方民主表面上每人投一票，票票等值，很公平。但是财团、富人会透过很多方面来影响政治。虽然只投一票，但是他们对于公共政治的影响绝对不成比例。

第二，处理公共议题要兼顾各阶层利益。民主的重点在于政府运作如何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可是很多人误认为，我们应该先要求一人一票，大家都来选领导人。那是形式，形式不是重点。比如说，美式民主是人人一票选总统。中国领导人的产生，从江泽民开始，就有机制存在，但若从西方角度看来是不及格的，因为它不是全民普选。其实对民众而言，只要中国政府运作得好，可以解决问题，不会引起政治动荡，这就是值得继续下去的制度。

我比较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果实是否全民共享。弱势群体不会讲话，又不会写文章，没有发出声音的管道。影响政府的常常是财团以及精英。因此，我们设计政治制度时，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弱势群体的声音不被忽略。

记者：您刚才谈到贫富差距的问题，政府的决策一定程度上被财团等利益团体左右。台湾八、九十年代进行了国营企业的民营化，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的加剧。您认为大陆在国企改革方面应该吸收怎样的经验教训，该作何准备呢？

林金源：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国营企业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凡是具有规模经济的垄断产业，或是提供公共财的产业，就适合成为国营企业。这样一个国营企业，会对消费者有好处，比如水、电。大陆的国营企业很多，许多是以往计划经济制度留下的历史遗迹。

台湾在八零年代之前政府控制公营企业，所得方面很平均，并且用公营企业来支持民间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既有经济成长，分配又很平均，达到了全民共享。

“抓大放小”是正确的，台湾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台湾的早期很多国营企业是由国民党接管的日资企业。国营企业如果经营正确的话，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成长，除了刚才提到的水、电等民生必需的产业。当然国营企业不该与民争利。因此，这种调整是正确的。

但是要预防一件事情，民营化过程中谨防其落到财团手中。台湾就有这样的经历，而且还要注意的是不要为了民营化而民营化。很多效益很好的国企也被贱价卖掉。因此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务必要注意不能因为民营化而民营化。我们不能认为国营企业就是没有效率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就是国营企业，但是它经营得很好，效益很高。南韩在日本二战投降后，很快把接收的日资企业民营化，贱价卖掉国企。导致韩国走向大企业、大财团。

记者：有人提到，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富强的崛起，而不是文明的崛起。您对此怎么看？

林金源：这是我非常忧心的，也是我一直呼吁大陆应该努力的方向。大陆经济的崛起，只要有对的制度，不犯太大的错误，经济崛起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文明崛起是不容易的，过程比较漫长。

如何进行文明的过渡呢？不要让经济的发展腐蚀人心是很重要的。首先分配上要平均，有些人太有钱就会“示范”奢侈。如果要文明，可以多发展一些公共建设，并可从知识上得到乐趣，从教育上得到人格品味的提升，不要在物质上竞争。中国曾经是礼义之邦，不应该去学西方的消费文化。西方的物质消费其实是厂商有目的倡导出来的。厂商会通过广告刻意制造一种消费文化，告诉大家现在有一个新产品和以前的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些不一样是被夸大的。比如，每次来大陆开会，都会发放瓶装水，但最近美国的一个环保团体倡议不要再用瓶装水，瓶装水隐藏一个很大的谎言。美国企业先拿广告告诉大家自来水是不能喝的，然后告诉大家应该喝瓶装水，其实这些瓶装水的来源还是自来水。而喝完以后的塑料瓶就会以邻为壑，丢到落后国家，造成他国的污染。所以，如果每人都带一个可以长时间使用的水瓶

的话，一念之间就可以改变消费习惯。

事实上，美国已经走上消费主义的道路，台湾也是这种氛围，但是大陆还没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现在要改还是来得及的。

记者：“欧元之父”罗欧特蒙代尔先生2001年曾预言，“未来十年将出现三大货币区”，亚元区就是其中之一，您认为现在亚元区迟迟不见端倪的原因有哪些呢？

林金源：现在很明显的一个典范是欧元，那是因为欧洲这些国家同构型比较高，例如发展水平，工业化、历史文化背景等。但是亚洲太复杂了，开发程度不齐，而且历史上有过很多冲突，譬如说，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冲突，最近又和菲律宾有着南海问题，如果在主权争议上有冲突，在军事上、外交上互相对垒，是不太可能去创造一个共同的货币的。所以，亚元区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什么要创造共同的货币呢？对于欧元区来说，欧盟这些国家想与美国分庭抗礼，这样在谈判的时候可以增加筹码。现在大家普遍预测，未来世界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亚元这个局面短期很难做到，倒不如先把东亚内部互相的冲突问题解决，在资源开发上可以合作共享，那么整个亚洲的经济就可更上层楼，更融合在一起，这对三足鼎立的态势是有帮助的。

我还想强调一点是，欧美列强的世界观，总认为国际间是零和游戏，资源你多用一份，我就少用一份。但是中国受过儒家王道思想熏陶，有着共荣共存、天下为公的精神与价值观。因此怎样做到双赢，而不是玩零和游戏，有你没我，大家互相争斗，中国是可以示范这样的道德价值观的。

中国政府要对环境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记者：黄安利



刘绍臣

1972年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主任和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兼职教授及北京大学客座教授。1994年入选美国地球物理联盟 Fellow, 1981、1989、1990年先后获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杰出论文奖, 1993年获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理事奖。

「国家要把全球暖化当做真正新的科学、对国家非常重要的科学, 把教育, 社会放进去, 纳入整个国家政策的考虑。」

记者：您这次带来的报告主题是“中国东部水资源危机和可持续发展”，主要内容是中国东部水资源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报告中您提到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气象灾害这几个概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刘绍臣：气候变迁从纯粹学问的角度来看包含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主要是指全球暖化。气象灾害是本来就会发生的，由于全球暖化的影响，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升高了。

记者：全球暖化会对中国带来不少影响，为什么您这次提到水资源？

刘绍臣：温度增加的话，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暖化的影响只不过是气温升高一点，海平面抬升一点，虽然是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可以等一阵子。我也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等上十年二十年。但水资源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受温室效应影响已经一百年了。洪水的灾害是立竿见影的，但其实干旱问题更加严重。在资料上，干旱带来的经济损失超过洪水灾害好几倍。

随着气温升高，中国东部的大雨将增加，中小降雨减少。中小降雨是地表水的主要补充来源。气温升高，蒸发也会加剧。根据 IPCC 工作报告预测，到 2040，全球气温还会上升 0.5 度，这样东部干旱月份会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多。实际上不只是东部，这是全中国都需要应对的问题。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缺水的国家。而且中国现在大型水库建了很多，中小水库远远比不上先进的国家，水资源的回收循环利用，更是比先进的国家差了几倍。如果中国不针对水资源做一个好的应对措施，以后无论是农业用水，民生用水，工业用水，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去找出应对的方法，那就是自讨苦吃，整个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记者：中国提出“低碳城市”的概念，来延缓全球暖化，您认为这样的措施效力是多少？

刘绍臣：中国的“节能减碳”和我说的减碳不是一回事。我说的减碳是碳排放量总量减少。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指能量利用率增加。比如 1 吨煤，我现在的排放量是过去的一半，但我使用的总煤量是过去的十倍。这样总体的碳排放量还是增加的。而且现在减碳已经来不及了。CO₂ 在大气中可以存活 100 年，减碳的效果至少要 50 年才能看到，50 年内全球气温就会升高，东部旱涝灾害增加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因旱涝灾害而死的人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通过拓宽水道、加固堤坝、兴建水库等方式，来减少灾害的损失。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应对气象变迁的态度如何？

刘绍臣：中国基本上接受国际（IPCC）看法，并且 IPCC 里面也有非常多中国科学家。但 IPCC 相当保守，所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暖化，都只不过是气温升高一点，海平面抬升一点，虽然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可以等一阵子。洪水及干旱和这个有关，但中国政府不认为这样；虽然 IPCC 说有关，但也没有说有多严重。中国政府认为这并不紧急，但我认为是很严重的。

记者：中国应对气象变迁的措施如何，是否是积极有效的？

刘绍臣：中国对气候变迁，做得和其它政府也没有差多少，方法也差不多。针对气候变迁，一个国家通常要做两项重要措施：一是缓解措施，缓解就是 mitigation，一个就是调适措施，就是 adaptation。节能减碳是缓解，调适是它已经发生了，我怎么应对。中国根本就没有应对，很多其它国家，好比英国，荷兰，海平面慢慢升高，他们早就开始应对了。英国保护大海闸的工作，已经在做，而且他们要做得更好。但中国政府根本不想做，认为这是

自然现象，过去就算了。即使是自然现象，看它越来越严重到这个地步，可以不去好好应对吗？只是认为这是自然现象，过几年就没有了，这是太天真的想法了。

这里还有在政府和科学界的认知的问题。中国把它当做一个问题，但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 PM2.5 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可是呢，我们的政府官员，环保局的人员，好多年来根本没当一回事。PM2.5 相对于全球暖化来说，是更具体的。除了中国的官员，全世界认为都是非常严重的，他们还是不承认。2016 年才定标准。别的国家三十年前就把标准定出来了，而且已经执行了。这个就是“鸵鸟政策”。连那么清楚的问题都不去解决，全球暖化问题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你怎么期望他，把全球暖化比较抽象的影响重视起来。

记者：但中国政府也已经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提升到一个怎样的层面来重视？

刘绍臣：中国是有在做，但不是针对暖化做。云南大旱已经两次了，中国是说要多建中小水库，还是当做一个常规的措施。自然灾害本来就有自然起伏，自然起伏上有频率越来越高，但人们看不到慢慢上升，只看到起伏，起来就做，下去就不做。云南旱灾没水吃，小孩子走十公里的路，每天挑水回家煮饭，这多辛苦。如果云南中小水库多，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国家要把全球暖化当做真正新的科学，对国家非常重要的科学，把教育，社会放进去，纳入整个国家政策的考虑。

中国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用在这种大型的调试工程上。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决心，意识到这是非做不可的事，那就可以做得很好。像南水北调这么大的工程都能实施，建几个小水库，花不了多少精力。而且中国政府行政效率也挺高的，只要他们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还有一二十年

记者：龚瀛琦



龙永图

现任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为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 WTO 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不要把国际环境看得一塌糊涂，美国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欧洲经济总量很大，加之技术和制度的优势，会有很大的恢复弹性。我一向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

记者：今年以来大家非常关心 GDP 增速问题。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提出今年经济增速 7.5% 的目标，是八年来首次“破 8”，上季度统计出的数据是 8.1%。你如何预判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速？

龙永图：中国经济转型仍需经历很长时间，东部发展增速放缓，但中西部势头迅猛。上个季度虽然总体数据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看到四川、重庆、贵州的增长还有 14%~15%，在整个中西部地区，投资拉动的趋势还是很大的。我认为今年 8% 的增长速度没有问题。

记者：对于东部来说，是否到了发展的一个瓶颈期、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

龙永图：对东部城市而言，的确会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调整过程。但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中，不应过快放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加工贸易。因为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培育需要时间，高端服务业也并不是很快可以成熟起来的，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已经拥有的市场。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还有 10 年到 20 年，这符合我们的历史情况和人口构

成等现状。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工业化搞了一两百年。转型应该是提高质量，满足市场需要。在大家认为劳动力开始变得更加昂贵的时候，中西部的劳动力依然具有竞争力。

记者：有人认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你认为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龙永图：不要把国际环境看得一塌糊涂，美国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欧洲经济总量很大，加之技术和制度的优势，会有很大的恢复弹性。我一向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今年中国前三个月对外贸易数据不是很好，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总体还是看好的，去年有20%的增长。我觉得今年净出口出现两位数的增长---10%~15%，还是可能的。所以不要轻易放弃我们已经拥有的国际市场，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记者：现在社会上对于物价、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的关注度很高，你觉得这些民生问题会影响中国发展吗？

龙永图：中国现在的通胀压力其实并不大，主要体现在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属于结构性通胀。可以看到工业品的价格并不高，而老百姓能够感觉到高的那部分恰恰是应该涨的。我认为这符合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逻辑，农产品是该涨的，老百姓要理解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带来中低收入群体的困境，所以要用必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例如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战略性的结构补贴不可避免。

东欧国家的政治联合和合作

记者：陈丽娟



Miles Kahler

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所的 Rohr 教授，主要研究太平洋国际关系。同时也是 UC 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的特聘教授。

「一个既包涵政治领域又涉及经济领域的广泛的区域机构的建立，以及一个能够使各国最高领导层汇聚一堂的峰会机制，是促进经济和政治之间良性关联的途径之一。」

记者：您提到经济的互相依赖是维持亚洲区域秩序的保障。我们都知道，尽管在经济领域，亚洲的融合已经深入地推进了，但是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却表现滞后。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Miles Kahler：随着东亚进一步融合，各国政府都有大体上相互独立的经济和政治 - 军事问题。在发生政治冲突的时期，政治合作的滞后对维持各国经济联系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同时也削弱了经济联合的积极溢出效应。一个既包涵政治领域又涉及经济领域的广泛的区域机构的建立，以及一个能够使各国最高领导层汇聚一堂的峰会机制，是促进经济和政治之间良性关联的途径之一。东亚峰会就是这样的一种论坛。

记者：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机制是维持东亚和平的一个途径，您怎么看？中国能够并且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Miles Kahler：等级机制曾经是东亚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来不太可能继续如此。这个区域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一些大政府，他们不太可能接受自身屈居于次要地位的模式。然而，

中国在区域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却可能受到欢迎。

记者：在亚洲，美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中美关系。那么，您对美国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排序有什么看法？

Miles Kahler：美国和中国都无法在东亚维持一个等级顺序；二者之间的敌对会危害区域间的秩序。设计一个将中国和美国都纳入的新的区域秩序对东亚来说是最优的策略。在维持区域和平以及经济融合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广泛目标。

记者：在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矛盾，诸如长期存在的海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最近中国和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争端中的僵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问题能解决吗？对于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共识和相互信任，您有什么建议？

Miles Kahler：像拉美和欧洲一样，东亚也没有找到解决领土和领海冲突的被广泛接受的方式。双边和多变的交流可能会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政府也可能选择国际法律裁决或者类似国际法律裁决的方式来解决。比如，东盟国家（ASEAN）政府间就曾经为了解决一些领土问题而求助于国际法庭。

记者：尽管东亚存在很多政府间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比较分散，整合程度不高。那么亚洲能否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区域秩序？为什么？

Miles Kahler：东亚可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机制，完全没有必要模仿欧盟模式及其高度复杂的组织机构。为了使得这些机制在促进更深层次的经济融合以及减少军事冲突方面发挥作用，需要一个不同的制度设计。

强调地区主义是东亚合作的出路

记者：陈夏露



庞中英

中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之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未来的亚洲秩序必须是地区主义的秩序。」

记者：您在分论坛上演讲时提到东亚合作不要只谈美国的问题，更要认识到内部的矛盾，具体是指？

庞中英：我们不要任何事情都强调是因为美国因素，美国的确是个因素，它不愿意看到东亚合作，他愿意看到的是跨太平洋的包括美国的地区合作，即亚太合作。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也比较好解决，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地区合作、东亚合作是必要的。美国是个太平洋国家我们还可以承认，但是美国绝对不是个亚太国家。亚太只能是（亚洲）西部的这些国家，这是不能让步的，就像我们也不能说美国是欧洲国家一样。欧盟里没有美国，那么东亚合作为什么就要有美国呢？东盟的东亚峰会把美国请进来，日本把美国请进来，韩国把美国请进来，这说明东亚合作它的主要障碍是在内部。这些国家为什么要把美国请进来？主要就是为了平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东亚地区主义是不可能的。

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是一种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也是让我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安全的指导。民族主义是一种，根据地区主义思考东亚合作是另外一种。我们不能用民族主义定义地区主义，也不能用帝国主义去考虑，帝国主义跟地区主义是相互冲突的。总之，大家如果真的要合作，就不要一味指责美国，说是美国让我们东亚合作不成，而是应该去找我们东亚内部的原因。比如法国和德国合作，柏林和巴黎的距离绝对要比华盛顿和柏林或者巴黎的距离要近得多，尽管在历史上法国和德国冲突了很长时间，但还是看到了法德两国走到了一起。而我们中日两国，北京和东京或者上海和东京地理上离的很近，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日

本是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号盟国，他们的距离更近。现在中日关系如此复杂如此困难，我们在地理上离得很近，但是心理距离得很远。

因此现在谈地区主义太奢侈了，但是地区主义是解决亚洲问题的唯一办法，现在大家把地区主义忘了，而且今后可能还会继续遗忘。但今后还是要把地区主义请回来，还得要强调在地区的框架之内解决问题。欧洲甚至非洲的经验都可以学习，因为非洲不仅仅是一个大陆，他还有很多共同的特性和共同的未来。东亚也是一样的，现在他们强调说中国要恢复朝贡体制，但是未来我们既不是要恢复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也不是恢复日本的大东亚共同圈，更不是维持现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这样帝国的自由体制，而是形成一种地区主义秩序，是像欧洲那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秩序。比如像爱尔兰甚至更小的国家，他们都在欧盟里，这样就把小国的问题解决了，也把小国对大国的担心解决了。现在大家担心中国的崛起这个问题就可以这样解决。未来的亚洲秩序必须是地区主义的秩序。

现在大家因为美国、因为自己内部的各种因素，都不愿意搞地区主义。当年胡适说少谈一些主义多谈一些问题，今天恰恰相反，今天的东亚包括我们这个会议需要多谈一些主义。所以我觉得今后中国的方向就是推动东亚朝地区主义的方向去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地区主义真正能够使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欧洲为什么有 27 个国家都加入欧盟？欧盟对大国有吸引力，对小国有更大的吸引力。苏联解体之后欧洲一些小国有个口号叫“Return to Europe”，“回归欧洲”，这个欧洲就是当时的欧共体。现在在东亚搞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同区，没人感兴趣；也不是搞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体制，我们要以亚洲为中心。

因此我认为未来东亚的秩序既不是大东亚共同区，也不是美国为中心的秩序，而是地区主义的秩序（regional list arrangement）。但恰恰是因为美国回来了，所谓回归亚洲，把地区主义忽略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记者：这次上海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的战略，请问您怎样看待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

庞中英：中国的未来还是光明的。回想一下过去这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管什么阶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说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巨大的成就和巨大的问题同时存在，但总的来说是积极的。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今后十年要保持我们积极的势头，不光是发展，也包括我们这个取得成就的积极势头；也要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一方面保持了积极的势头，另一方面又把我们一些尖锐的、复杂的、困难的问题至少能够有效地加以控制、管理、治理，那么我们中国未来十年大有希望。

现在西方正值危机，欧洲、美国都是，而对俄罗斯来说苏联解体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我们要保持好我们的势头，解决好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宽泛地理解，比如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上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等等。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

的话，我们的改革开放、甚至是过去一百年来为中国崛起所做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可能被慢慢消化了。西方在过去几百年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现在有人在说西方的没落、西方的危机。比如希腊，西方文明的源头还在希腊呢，但是现在希腊人用悲剧来形容。但是中国如果像我说的保持势头加上解决问题，包括各种微观的宏观的问题，接下来还会大有前途。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们的未来一定光明，你必须要满足这些条件，要解决这些问题。

即使取消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也会下降

记者：Caspar van der Plas



Ronald R. Rindfuss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他是社会人口统计学家。最开始，他大部分研究都与生育有关，也包括人口，环境，移民和家庭人口结构。

「取消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短期内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并不会发生变化。问题是现行政策是否能够控制中国的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

记者：如果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将会发生什么？

Ronald R. Rindfuss：短期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素质对此也有很大影响。目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学术圈是一个热点话题。围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后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究竟会发生什么。

记者：您是否认为有或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在未来十年都会下降呢？

Ronald R. Rindfuss：如果继续施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话，人口出生率就会比没有该政策的情况下，下降得更快。这就意味着即使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仍会下降。但是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城市地区相比，中国农村地区似乎保持着较高的人口出生率。然而这些情况又和城市移民、财富增长等其他问题相联系。

记者： 户口制度是指一种带有等级色彩的居住许可系统。在居民户口簿上，一个人被官方地确定为农村户口或城市户口，此外还有其他的身份信息，例如姓名、父母、配偶和出生日期。基于此系统，在农村出生并具有农村户口的妇女，即便移居到城市，也需要遵从农村的生育政策。这个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农村和城市地区财富的非均衡增长。因此，这是否意味着为了减少城市 / 农村地区的财富差距以及对中国的总人口出生率产生正效应，在改变或者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应该先改变户口政策？

Ronald R. Rindfuss： 由于目前的人口政策，城乡地区的财富差距确实很大。生养子女和家庭财富积累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如果能够改善中国的户口制度，降低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这对总人口出生率必然会产生影响。问题是在这之后进一步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是否会产生什么不同。基于独生子女政策是在户口制度下推行的这一事实，改变户口制度，对现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方式也会产生影响。

记者： 您能评论一下“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独生子女政策”的这种说法吗？

Ronald R. Rindfuss： 没人真正了解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后会发生什么。有太多变量会对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产生影响。每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量大概在 1.2 到 1.3 亿左右。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人口总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取消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短期并不会改变人口增长率。问题是现行政策是否能够控制中国的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中国角色

记者：车 锐



Takashi Terada

京都同志社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中国应该争取在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中实现自己的经济贸易利益。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记者：在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可能的阻碍是什么？

Takashi Terada：在外商投资建设汽车企业时，中国存在对其投资的管制，要求其必须与本地公司合营，并且持股比例不能高于 50%。日本产业界对这一政策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一管制界定不清晰，并且审批条件会在不经通知的情况下发生变动。因此，在日本和韩国都存在类似的抱怨。来自企业的诉求致使两国开始要求与中国建立多边投资协议，其中包括监管透明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

自由贸易区意味着各缔约方之间需要签署贸易协议。因此，对日本和韩国来说，由于他们在农产品价格方面的竞争力较弱，他们会对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更加谨慎。

记者：我们如何能够缩小中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价值观方面的差距？

Takashi Terada：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的不同，如人权、民主等等。许多人会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对话。但至少，我们认识到了彼此的差异。因此，如果缩小政治和价值观差异是几乎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不在不缩小差距的前提下尝试合作呢？我们可以很轻松

地找到中日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例如：区域性金融框架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缩小政治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

记者：为建立地区性自由贸易区框架，中国应该做些什么？

Takashi Terada：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正在进行谈判时，中国开始比以往更加积极地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当 2011 年 11 月日本决定加入 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时，中国加速了缔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步伐。这意味着中国受到美国从 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获得利益的启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自由贸易区中的可得利益，尤其是多边利益。我认为中国应该争取在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中实现自己的经济贸易利益。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记者：为了加入 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

Takashi Terada：TPP 中的劳工部分要求成员承诺遵从国际劳工组织建立的准则，包括集体谈判权、结社自由、禁止强迫劳动和使用童工、禁止用工歧视。然而，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所有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建立工会来协商工资及解决其他问题。

记者：您怎么看待在其他国家中兴起的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正如您在《Games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Order in East Asia》一文中所提到的）

Takashi Terada：我认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就是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2008 年 11 月北京迅速敲定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被吹捧为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府干预，中国被快速地从世界经济低迷中拉了出来。这一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中吸引了很多赞赏者，他们希望能够模仿中国。例如，意识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危机如何强化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据报道，2009 年 6 月在俄罗斯一次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的会议上，金砖四国提出了放弃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可能性。但在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决策程序就决定了实施一项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策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这就是中国模式具有吸引力的原因。然而，中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价值观上有所不同，比如，对民主、人权、知识产权的推动。这些根本差异使得日本不可能完全加入到北京共识的阵营中，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日本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

记者: 关于中国和亚洲邻国的海上争议，您怎么看？

Takashi Terada: 如果中国想要解决这些海上争端，我认为除了遵守 UNCLOS（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别无选择。UNCLOS 是解决领海纠纷的国际准则。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国家，应该通过提供符合国际法的证据，而使其领土主张合法化。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都想了解中国在南海提出领土主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我意识到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在不断蔓延，这些人指责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领土争端时，立场不够坚定。尤其是在互联网把匿名发表激进观点变成现实之后，在任何国家处理或者控制网络民族主义都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中国崛起是一个超大吨量级国家的崛起

记者：章若瑶



王 文

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和平崛起代表一种战略目标。有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代表必须完全放弃武力和战争的手段。全世界应该相信中国是有和平崛起的决心和目标，应当和中国一起努力，使中国的崛起真正变得和平。」

记者：骆家辉在今年年初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专访时，谈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时称“世界各地人民和世界各国政府都质疑中国的意图。”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王文：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国际质疑声的扩大。几天前，我采访了“中国威胁论”的倡导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多年都在鼓吹中国威胁。但他也承认，美国学术界同意他观点的只有 10%，75% 的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从这个角度上看，认同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另外，国际舆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在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08 年以来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崛起持承认、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认为中国崛起是可控的，而非会带来威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多次说过“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历史终结论”创始人弗朗西斯·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中国的。

如果非得说骆家辉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的话，那可能就是，随着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多地曝光在全世界的媒体及舆论下。现在全球各大主要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关

于中国的报道，这在过去是不曾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全世界都拿着显微镜看中国，西方媒体又喜欢使用负面语境来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数量会变多，容易造成全世界都在质疑中国崛起的假象。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人也学会解释和理解中国的崛起，持肯定态度的报道比例在不断上升。

记者：米尔斯海默教授接受您采访时提到，反驳他观点的论据九年来毫无新意，这是否说明我们在论证中国和平崛起合法合理性问题上长期没有取得什么突破？

王文：从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研究的瓶颈，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在过去的九年内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第二，过去五百年中的大国崛起基本没有和平的，使得和平崛起这一命题像哥德巴赫猜想，本身就很难论证。第三，中国崛起是一个超大吨量级国家的崛起。19 世纪英法崛起是千万级人口的崛起，20 世纪日美崛起是亿级人口的崛起，而 21 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则是十亿级人口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相当于 19 世纪五十个到八十一个英法这样吨量级的崛起。这么超大型国度的崛起所带有的不

记者：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新论据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同？

王文：我觉得理论的进步首先取决于实践。19 世纪是小国的崛起，20 世纪是中型吨量级国家的崛起，21 世纪是超大型国家的崛起。理论是否能发生本质性的进步取决于实践的发展，中国崛起的道路还有很长，这个国家的未来还很不确定。有可能过了三五十年，中国崛起了，但没有发生任何一场战争，这时自然而然，实践已经实现了理论的创新，论证起来就会容易得多。未来是否能破解和平崛起这个命题，关键在于实践的发展。

记者：去年《环球时报》有发表时评称“中国自己也应把握好和平崛起与敢于摩擦之间的平衡”，认为和平崛起理念和我们在地区发生军事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是矛盾的。

王文：和平崛起代表一种战略目标。有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代表必须完全放弃武力和战争的手段。全世界应该相信中国是有和平崛起的决心和目标，应当和中国一起努力，使中国的崛起真正变得和平，这样是全世界之福，东亚之福，当然也是中国之福。如果某些国家捣乱，中国该出手时也得出手。

记者：有一些网民质疑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米尔斯海默也提到，他相信在中国有相当部分赞同他观点的人，在您看来现在国人对于和平崛起的认同度如何？

王文：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严密的调查。如果凭感觉，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的人占大多数。但另一方面，当中国受到欺负时，希望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也占大多数。这是有点矛盾的两种想法，折射出中国人现在对和平崛起复杂和矛盾的心态。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正常的，典型地反应了现在国民心态中对未来的迷惘、纠结。现在国内环境、国际博弈非常复杂，中国未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我们不要跟别人打架，同时，持大国沙文主义的人非常少。总体上中国老百姓还是很温顺的，但温顺并不代表任人欺负。

记者：您对解决领土争端的建议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也有观点认为现在很多问题已经无法维持过去的稳定了，如今的外交政策应从谋求稳定转向解决问题，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文：我觉得这种观点很有道理，现在当然不能采取过去的“鸵鸟政策”。这种看法和我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不矛盾。过去我们在南海等问题上做得更多的是“搁置争议”，没有去“共同开发”。我重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至少在与菲律宾的争论上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地挑起在黄岩岛等问题上的争议，而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不想搁置争议，他们想要挑起主权之争。主权之争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中国必然要作出回应。如果最后大家都不服，只能用战争解决。

我希望他们能搁置争议，然后是“共同开发”。后者对中国更重要。南海在过去三十年开采了一千多口油井，而中国的第一口油井一个多月前才刚刚开发。过去因为实力、战略意识等都没有达成这样的目标，现在我们应主动地有所作为。在一些争议地区，完全可以主动地跟争议对象国进行合作，搁置主权争议，重要的是大家怎么合作开发，怎么按照贡献分成利益。

记者：您提到美国责任对防范东亚战争的作用，在这一部分，我们是只能寄希望于美国自身的约束，还是也可以通过一些努力，对美国形成一定约束？

王文：两者都有。东亚问题现在的症结和解决方案实际上都和美国息息相关。东亚要走出现在的困境，降低战争几率，美国当然是主要的行为者。美国在东亚的离岸平衡作用造成的结果是，亚洲现在任何两个国家间关系都比他们与美国间关系要差。美国必须要承担和

平的责任，不要再挑动东亚各国间的怀疑与博弈。一旦东亚发生战争，美国一定不会从中获得太多利益，而且战争的发生和美国一定脱不了干系。如何减少战争的可能性，美国的责任不可缺少。一方面，我们要依托中美、日美、韩美、非美间的对话去影响美国的利益集团、智库和媒体，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东亚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博弈能力。在对台军售、军事演习、菲律宾等问题上，给美国施压，表明强硬的反对态度。

记者：您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加强媒体与民间对话在降低战争几率中的作用？

王文：首先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崛起。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国家在争议问题上表达自己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都有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菲律宾的媒体和民间也在挑动，菲律宾外交部长甚至说，不惜和中国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但实际上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武力。怎么样解决这种情绪呢？就是加强主流媒体及意见领袖们的对话，只要他们实现互相的理解，应当可以有效地减少一些因为误判而产生的误解和敌意。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路径。

记者：您提到民族主义情绪和东亚和平之间越来越不协调，有学者认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世界观念的支撑，同时他们将眼光投向中国传统。您觉得我们能否从中发展一种能够引导地区秩序构建的理念或原则，从而降低战争的几率？

王文：这当然是学者的选项之一。现在学者对于中国对外交往以及中国未来的大战略基本上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中国古代主义，实际上有点像朝贡主义。这一派近两年发展得很快，这一派学者在研究中国能否恢复到明代时期的朝贡体系，通过各国臣服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实现和平。这种研究方向刚开始，但即便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现实中推广也非常困难。因为朝贡体系把中国放在东亚金字塔的塔尖上供奉，在现实中不可能重回历史。第二派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以欧美为中心，中国只要融入欧美建立的国际体系就行了。这一种观点也不太可取，因为中国崛起不可能永远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肯定有所改变，且当前的国际体系是不公平的，也很有改善的空间。我比较认同第三种实践理性的观点。现在的东亚状况是过去五百年中未曾见过的，首先因为它情况复杂，其次因为国家和人口非常多，再次东亚地区的历史后遗症很多。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实践去摸索。东亚未来秩序重构的模式和欧美一定是不同的。欧美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目标先行，东亚的模式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模式的困难比起欧美可能更大。它是问题导向型的，哪里出现了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后自然会出现一条道路来。

记者：回到这次上海论坛的主题“未来十年的战略”，您能不能从战争可能性的角度预测一下十年后的东亚格局？

王文：这很难，我是一个未来不可知论者。实际上，每个人都无法预测。特别是在亚太，这是全世界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大国林立、宗教复杂、文化差异、经济失衡、意识形态冲突、贸易和领土争端激烈等等，所以要预测十年之后是非常难的。但是这次上海论坛的话题特别好。因为今年是世界的换届年，有 50 多个国家，包括亚太地区的几个大国比如俄、美、韩、中都在换届。尤其在中国，权力交接成功意味着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可能会比较清晰一些，确定性会加强。所以这次上海论坛用“未来十年的战略”做主题，这个角度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中国本体论。再者，今年对亚太地区也非常关键，今年实现的权力交接会使得未来十年各国的政策变得更加明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上海论坛的主题有一定的前瞻性，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至于十年后的东亚，我觉得很难预测，就先保持我谨慎的态度吧。

未来十年电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将会不断提高

记者：倪佳炜



王子冬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动力电池实验室主任、国家 863 电动车重大专项动力电池测试中心主任，中国电动车领域第一权威。

「我们要把国家整个动力电池生产和使用的产业链打通，这才是最重要的，才能让它形成一种循环。有人造，有人买，有人用，还有人再造，还得有人回收。资金和积极性得流动起来才能挣钱。」

记者：您在圆桌会议的演讲中提到，从几次电池事故中，我们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其中一点就是不能一味地追求续航里程、加速性能和快充。但在老百姓看来，车能走的远、加速性能好、充电快就是对电动车的要求。那么您的这一观点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提出的？

王子冬：实际上，续航能力并不是动力电池的技术指标。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动力车来说，装得电池越多，续航里程就越长。但是多载电池车就会变得很重，也就会带来许多其它问题。

电池快充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现在的快充电方法会减少电池寿命。这一点我在论坛讨论中也有提到。笔记本电脑、电动车很多都是电池用坏的，用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充电”。现在的充电方式是日本电池生产企业 1990 年告诉大家的，这个电池就是这么充电。但是是否有更合适的充电方式，还有待探讨。

至于恒压充电，这是电池技术上的问题，有待改进。就目前电动车用动力电池的技术

水平来看，要想达到目前燃油车的诸多指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记者：那么国内动力电池的发展是否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和要求？在这方面，国外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王子冬：国外的技术的确比我们更先进一点。与国外相比，在材料的稳定性控制上、电池制造的自动化程度上、电池组的组合技术和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上，我们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就电动车用的电池来看，全世界都不成熟。产品的成熟意味着它可以变成商品，在市场上随意流通。国内动力电池只有达到这一水平，才可以说是成熟的。

记者：我注意到在目前国内电动车产业发展的这一阶段，政府投入了许多资金和政策支持。

王子冬：就电动车产业的发展来看，前期的确需要政府的支持，主要是牵引。一旦电动车产业技术成熟，就得让市场来考验了。能不能让一个商品成为真正的商品，关键有待于自由市场的考核，就像私人车一样。在政府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老百姓愿意掏钱去买，这个才能称为商品，否则只靠补贴是无法发展下去的。将来我们国家一定会从政府主导的方式中退出来，会在政策和资金补贴上支持。

记者：据我了解，目前国内部分城市正在优先推广电动公交大巴和城市专用电动车，如北京、深圳等。中国一汽、安凯、宇通等国内汽车厂家也都展出了自主研发的纯电动大巴，有的已下线，有的已经投入试运营。您认可这一做法吗？

王子冬：实际上，我认为目前的水平不太适宜发展电动公交大巴和城市专用电动车。现在有关电动车用动力电池的新技术出来的时间并不长，有很多事情还有待检验。就像我刚刚所说，它的技术远远达不到燃油车的水平。同时，电动公交车载荷大、每天跑的里程多，运行强度非常大，可靠性很难掌控。一个技术还不成熟的产品装在一个负荷非常大，工况又非常恶劣的车上，实际上有点拔苗助长。所以就目前来讲，电动车技术本身不太适合电动车大巴上用。因此我建议在这件事上应该有更多的技术层面上的考虑，因为它还不成熟。

记者：那您觉得政府应该重点在那一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王子冬：不能偏颇地讲某一特定方面，应该说，我们要把国家整个动力电池生产和使

用的产业链打通，这才是最重要的，才能让它形成一种循环。有人造，有人买，有人用，还有人再造，还得有人回收。资金和积极性得流动起来才能挣钱。

记者：正如您所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政府是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2010年，国家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全国设立了5个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示范城市。北京、深圳等地去年就已经审核通过了实施方案，但上海的实施方案至今没有出炉。您认为上海政府在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方面是否有所欠缺？

王子冬：我认为单凭一组数据不能轻易下结论，上海市政府在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方面还是非常努力的。上海市政府比较理智，没有盲动，但是不代表不作为。

记者：就目前国内情况来看，电动汽车的消费市场并不活跃，多数消费者对电动汽车仍持“观望”态度。您认为未来十年，这一现象会有明显好转吗？

王子冬：电动汽车在现阶段不受消费者的青睐，有诸多因素。但是这些问题将来都会一一解决。无论是从科技进步的要求，还是从节能减排的意识出发，未来十年电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将会不断提高，这是必然趋势。

亚洲应建立区域货币一体化单位

记者：余明智子、颜沁



Eiji Ogawa

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基金调查局客座研究员。研究项目（2011—2015 年度）：关于货币篮子的研究；政策研究领域（2006—2010 年度）东亚的金融合作与最佳汇率篮子的研究。

「中日两国既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所以在未来，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整个东亚都将会为世界经济发展发送源源不断的动力。」

关于过去：我们为什么需要“亚元”？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以高额价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的一幕还让人心有余悸。此后，东亚各国一直在寻求能够抵抗风险的合作机制。希望危机来临时能够从邻国获得资金帮助，以避免本国货币遭遇失控性贬值。

2000 年 5 月，刚经受金融危机的东盟的 10 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 3 国（即“清迈倡议 10+3”）的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CMI）。这次会议，将东盟内部原有的货币互换机制扩展到中日韩三国，以便在有关国家出现短期资金困难时进行援助，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清迈协议变成了多边化的一个协议，从个双边货币互换的安排变成了一个多边的互换，同时就《清迈协议》（CMIM）确定了每个国家的出资率，同时也建了一个 AMRO 来作为一个监督单位。

事实上，区域共同货币单位的概念一直以来在东亚地区被讨论，简称为 ACU。在财政部长会议上，就提出了建立区域性货币的理由，当时把它命名为亚洲货币单位。而韩国学者则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叫 RCU。现在 Eiji Ogawa 教授将这几个理念合多为一，倡议在东亚地区来推出一个区域性的共同货币—AMU。Eiji Ogawa 教授在他自己设立的模型中，选取了东

盟 10 国加中日韩三国货币组合成“亚洲货币单位”，通过对 2000 年到 2007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比较，他发现该期间内这种区域货币的表现比美元、日元或者欧元都更为稳定。

关于现在：实现“亚元”道路曲折

在 Eiji Ogawa 教授看来，我们虽然很需要“亚元”，但这并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顺利推进。“如果你要问我‘亚元’出现的时间，我只能说，这会是个非常长、非常长的时间。”

他认为，现在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当不一致，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有可能在三五年后达到与日本的同等水平；而韩国和其它东盟国家需要一定的条件才可获得提速发展。亚洲宏观经济的趋同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现，直到那时，“亚元”的机会才可能到来。

Eiji Ogawa 教授也提供了 AMU 两条实现路径：一是通过监督，二是通过私营部门的交易，前者要容易一些，只需要政府的决定，就能实现 AMU；通过后者引入 AMU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实验表明，AMU 的实现路径是需要双管齐下的，这样 AMU 可以立即开始对汇率政策的监督以找出区域内汇率的偏差和过度的波动。

第二条私营部门交易的路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种金融产品一揽子的货币作为面额，在某些市场进行交易。而且也要考虑包含哪些货币作为 AMU 的成分，尤其是这些金融产品，不仅仅是经常账户，还有资本账户可兑换，所有的成分账户都是可以实现的。

用以监督的 AMU，短期可以检测出本国货币对于其产生的偏差，而长期来说，更是可以看到 AMU 与货币一揽子的汇率变化。针对以 CMIM 为基准的 AMU，对比每个东盟货币跟 AMU 也可以看出哪些是估值过高或者是估值过低的。

从交易上来说，AMU 可以用于经常账户、资本账户交易的计价的货币，而且其内在价值的稳定，等同区域内外汇率的稳定。而且可以用于政府支付的方法。AMU 可以用于私营领域的交易，包括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计价，而且也可以用于大额的交易或者作为结算的货币，不管是在经常账户或者资本账户之下。

但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政府的良好监督之下运行。对于欧元区的前车之鉴，小川认为主要责任在于政府的放任。

“欧元区的经济危机是缺乏政府的监管而导致的。而我们提倡的亚洲统一货币是在各国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Eiji Ogawa 教授表示，“如果欧元区的各国政府和货币管理局能够做到有效监管，绝不会是现在的情况。”

关于未来：人民币无法成为 AMU 的核心货币

“亚元”的阻碍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宏观经济上的不一致，欧元的建立是以欧元区成员国让渡货币主权为基础条件的，而这在当前的亚洲政治版图上不易实现。有学者认为有一个核心更利于亚洲货币单位的产生和推动，并提出以人民币为核心能使 AMU 更具可行性。而且在 2010 年的上海论坛上，Eiji Ogawa 教授在创建亚洲货币单位的构想中，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出口及外汇等数据，给出了人民币 36% 的权重。但 Eiji Ogawa 教授仍然不认为人民币具有核心货币的特性。

“因为人民币波动幅度太大，包括汇率也一直不稳定，建立 AMU 的条件之一就是我们需要价值的稳定性。” Eiji Ogawa 教授明确表示不赞同这一观点，“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不具备可兑换性。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成分货币可兑换性是重要组成部分，可兑换性是捆绑和拆分 AMU 的必要条件，也是进行风险对冲的前提条件。所以我认为人民币不具备成为核心货币的能力。”

同时，AMU 的建立需要政府开放市场、放宽限制，Eiji Ogawa 教授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真正让这个巨大的市场自由化。“中国目前的市场还未开放，大多开放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其实在香港也无法完全进入开放的大陆市场，所以我们期待中国政府打开包括债券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中国政府应该开放资本账户，然后放宽资本的控制，不管是资本账户下的交易以及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Eiji Ogawa 教授如是说道。

而关于东亚经济圈未来 5 年内在全球经济将起到的作用，Eiji Ogawa 教授显得十分自信。在他看来，即便是现在，东亚也已被看作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发动机这个比喻意味着这个国家生产力强大，中国是未来的消费大国，日本也一样。也就是说未来，中日两国既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所以在未来，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整个东亚都将会为世界经济发展发送源源不断的动力。

市场不完善，是对创新最大的制约

记者：罗 芬



薛 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危机管理等。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等。

「政府机构要与社会组织有机配合。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建立一个体制，让老百姓看到不法行为就来举报，这样，人民群众如汪洋大海，就能把这些问题都抓到。」

记者：《OECD 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存在区域研发与创新不协调的问题。如北京占有更多基础研究资源，却没有相应工业基础。而上海企业活跃，正好缺乏强大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设施。您认为未来 10 年，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善？

薛瀚：这要具体分析。北京的研究力量非常强，有中科院和其他著名高校。但也要看到，北京已经是中国的政治、文化、高教科研中心，很难再成为产业中心，毕竟一个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成为所有“中心”。从其要素成本来讲（如北京人口膨胀问题已很大），并不适合发展那么多产业。这并不是说，它的知识潜力没有分发挥出来，而是它的其他要素约束，使得它不应该去发展那么多产业。当然，还可以探讨如何使北京生产出的科学知识能够更快更好地扩散。

上海的研究能力与北京差不多，也处在前列。上海和北京面临同样的问题，都要明确自己如何定位。有一点，上海比北京好，上海与长三角的协同比较好。北京与京津冀，环渤海的协同不如上海与长三角。长三角使上海很多创新实力，辐射效应非常强。

记者：您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会出现像苹果一样的创新型企业么？为什么？

薛澜：实事求是讲不乐观。目前政府能用的鼓励措施和政策工具基本上都用了。类似2011计划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市场与一个成熟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差距还很大，而且改善的非常缓慢。我们有时和中小企业的创始人聊，就了解到，现在办企业真不容易，背后有一系列问题。市场不完善，是对创新最大的制约。

记者：提到市场的完善，您以前也提到中国已到了市场环境、制度框架要有一个整体提升的关键时刻。请问您认为政府具体可以采取怎样的步骤来实现这一整体提升？

薛澜：这个方面有很多，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体会最深。例如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最基本的。第二、降低企业进入门槛，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垄断行为。第三、对不规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如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侵权等。此外，改善融资环境、建立比较完善的信用体系。这些都是完善的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您指出，研究人员的工资水平被严重压低，科技人力资本市场双轨制现象十分严重。这已经成为近年高校、科研院所中青年人才流失的重要诱因。能否结合您在国外求学、工作的经历，具体谈谈这一问题可以如何解决？

薛澜：提供公益服务的非赢利机构在中国叫事业单位。若它提供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很高。这些人力资本的形成，要花很大投入。有些需要特定的稀缺的人力资源来完成。世界各国对这些知识资本的形成，给予相应的激励。同样的岗位，在国外薪酬都比较高。当然，作为公益机构，市场化程度会略低，薪酬确实也受到一些约束。在美国，同样的工作，在政府拿得就少一些，不如在企业，但在政府工作有一定稳定性，退休保障也很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在市场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影子价格的。若政府提供的薪酬与这个价格相差特别大，就把整个人力资本的配置彻底扭曲了。

像中国的医院，不可能所有的医生，一下都丧失良心。实际原因是公立医院的薪酬体系极不合理。工资非常低，而其运行机制逼得医生要靠多开药等不规范的行为才能保证基本的薪酬。其它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情况类似（可能金融业除外）。应调整基本工资体系，实行年薪制，即，整体性工资，而不应是计件制。现在教师上一门课，给点课时费，这远远不能反映劳动的价值。知识型的工作，不应像垒砖，垒一块砖，给一块钱。必须实行整体性工资，同时相应对你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在我们国家已成这种风气，若要去实施，社会上会有一些不满或不理解。但我觉得若把道理说清楚，完全可行。

记者：您认为未来10年，科技的创新与进步，能让中国老百姓在生产、食品、自然灾

害等公共安全问题方面更有保障么？

薛澜：我觉得解决社会监管问题，科技的创新，不如制度的创新。归根结底，还是要完善我们的社会监管体系。

第一、监管的理念和体系要更加完善，机构的能力要大大加强。第二、政府机构要与社会组织有机配合。（食品、生产等不法行为）政府去抓，其实很难。如果建立一个体制，让老百姓看到不法行为就举报，这样，人民群众如汪洋大海，就能把这些问题都抓到。第三、企业之间，也可以建立互相监督、制约的机制。有很多成功的方法，我们可借鉴。如在核能安全监管上，美国有核安全管制委员会，对企业各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制定建立核电站的标准等。但企业之间，还有一个协会，各企业向协会缴纳高额的保险金。如哪家企业出了事故，哪怕很小的事故，都从这个里面扣钱，进行惩罚。大家必须加入这个协会，然后大家互相监督。同行之间的制约有时比政府制约更有效。

生产性服务业势必会向更加成熟的方向

记者：相慧莲



叶嘉安

地理信息科学、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家。1974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地理及地质系，现任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讲座教授、研究学院院长、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交通运输研究所所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科院地学部首位香港院士，2010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如果有一天美国不是世界了，而中国的人均GDP从3000美元上升到10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就是世界了，上海就是世界金融中心了。最重要的是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生产性服务业规律性地向大城市集中这种现象的出现？

叶嘉安：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服务业都不一样。工业可以分散在昆山、嘉庆这些小城市，它主要的是生产，之后再考虑运输问题。服务业要分散，它的对象是人，而人分布在各处。很多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起来了，工业聚集了劳动力，有人自然会有服务业，当然高层次、多元化的服务仍集中在大城市里。

完整的城市体系是必须的，即大、中、小型城市同时存在。有人问，能否把生产性服务业分散到非大城市处，但他忽略了生产性服务业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和人的见面。我们可以打电话、发电子邮件，但毕竟不够流畅。讨论大量文件时，见面交流更便捷、快速，穿过街对话总比乘一小时车来得方便。我们看伦敦、纽约、东京，经常人来人往，注重的就是面谈，中央商务区的价值正在于增强了办公室联系。

美国的华尔街、英国的舰队街、香港的中环，各自形成了聚集型的体系。从事生产性服务业需要搭建人际网络，但不能靠虚拟空间来实现。本世纪初科学大热，人们认为既然网络这么方便，何不在家里办公和学习。但真的有人这么做吗？人需要工作氛围，数码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情况很不一样。一般来说，只有10%左右的人在家里办公，其他都前往市中心。

办公室位置很重要，这也是生产性服务业不能分散的原因，城市发展一定要越来越集中。

记者：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前提，在中国它们有什么特点？如何看待生产性服务业的选址问题？

叶嘉安：在英国，工业化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工业革命发生在城市里，吸引了很多人进城从事工业，后来工业逐渐被服务业替代，但城市的基础是工业化。在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和海外不一样。1978年改革开放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旨在扶持乡镇企业。很多工业在农村和小城镇里遍地开花，这就是农村城市化，即城乡一体化。制造业汇聚了人，服务业自然发展起来。后来人们发觉乡镇企业的环境不行，于是把企业搬迁到小城市，再搬到中等城市，慢慢推导下来。农村已完成了过渡这一历史任务。

我国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比较发达，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赶不上？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慢慢集中，最终落实到大城市里。八十年代，昆山、苏州等地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国家索地建立中央商贸区，但有多少成功了？本世纪初，我们发现大量资源被浪费，土地被征用，来的人却寥寥。这就牵涉到选址的问题。发展工业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本、运输等因素，偏远之地意味着运费高、利润低。同时，我们有大量土地，却没有那么多工业，海内外的需求是固定的，工业不能无限扩张。服务业与人切身相关，但服务对人有一定比例，不能超出范围。工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有限制的，不能无限增长。

记者：在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历史发挥了什么作用？上海的发展对其他城市有什么借鉴意义？

叶嘉安：上海在1991年时开发开放浦东，当时生产性服务业还没起头，却有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我们要通过规划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城市。我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上海在民国初期时已经是一个世界城市了，所有最繁华的东西都汇聚在上海，而香港还是个渔村。上海有历史的背景，也被赋予了历史的担子。浦东试图重新成为一个世界中心，首先要提供充足的办公楼。当时有外国学者表示这种做法不够理性，太多的办公室会闲置下来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2003年时到浦东找房子已非常困难。如果没有浦东超前的规划，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都要滞后了。

其他城市想学习建设浦东的这种举措，有的没有成功。上海有的东西其他城市不一定要有，因为上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它向伦敦、香港、东京、新加坡看齐，哪些土地是需要的，就先规划起来。但超前也有风险，万一生产性服务业没有跟上就不好了。所幸中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度，不可估量。现在深圳等城市也在搞相似的开发，我们必须打一个问号，

等时间给出答案。

记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如何？什么因素推动着它的发展？

叶嘉安：生产性服务业势必会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工业越来越发达，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相应变大。像金融、法律、会计、调查、公共关系等，都是当前热门的话题。其中，会展是一个重要的行业，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工业增多，服务业增多，厂商也增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推出的服务就更多了，供给随需求变大。

生产性服务业的动力就是工业和服务业。工业的需求一方面来自海外，产品要销售到海外，必须提供物流等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内需市场也亟待开发。90年代时，上海的人均GDP只有1000到1500美元左右，现已接近15000美元，但人的基本需求都是一年5000美元，剩余收入促使消费水平提高，便推动了国内市场的开发。人均收入越来越高，内需就越来越重要。厂商多了，一定要找生产性服务业，由此形成工业链关系，一层带动一层，工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又与人均GDP有关。生产性服务业会遵循经济规律和全球潮流不断增长。

记者：十年后，上海会怎样？

叶嘉安：上海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上海现在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其阻力源于中国外汇市场的非浮动性，得不到国外的投资。但是上海作为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已经做得十分出色。

我们很难对世界下定义。美国是不是世界？但纽约就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国力强盛，其本土提供了大量资金。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中国现在还无法与其相比。如果有一天美国不是世界了，而中国的人均GDP从3000美元上升到10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就是世界了，上海就是世界金融中心了。最重要的是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们现在习惯了一种快速的增长方式，但奇迹不是永恒的。我们可以花更长的时间，不介意慢慢来，发展得太快没有好处。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GDP增长达到了三位数，但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跟不上，2000年初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上海照现在的速度发展没有问题，不必追求百分之百的增长。

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记者：许晓曦



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等职。

「十年后，人民币会有更大的接受程度，但我认为还不会是最重要的货币，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美元、欧元。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重要。」

记者：今年四月，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增大一倍，由千分之五增大到百分之一，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张礼卿：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代表我们的汇率制度更加灵活，更加反映市场供求，这对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增强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都非常有利。

记者：您刚才提到，香港可以成为离岸金融市场，但是又一种观点是，离岸金融市场比较自由，可能会变成热钱的流入地。您怎么看？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上海也在建设亚洲金融中心，那您认为上海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定位？

张礼卿：这个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香港的金融机构它也受到香港当局的监管。特别是现在这种全球性的加强金融监管。跟我们内地相比，比如说，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可能会有区别，香港比内地低，对一些交易投资的管理也可能内地要严一点。那边总体来讲，相对较自由，流动性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

上海与香港的区别就是，香港是个离岸市场，上海是在岸市场。长远来看，上海应该

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首先是全国的，然后是亚洲的，最后是全球的。上海能不能很快成为金融中心主要取决于我们的资本管制放松的步伐。上海应该发挥它的优势，健全金融机构，等待全国性的政策放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开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业务。

记者：欧元区正在经历欧债危机。您认为欧债危机将来会如何发展？

张礼卿：欧债危机怎么发展，有好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好的方向：通过各种改革的推出，货币金融政策的加强，财政联盟的实施，最后可能欧洲从欧债危机中走出来，欧元区变得更加成熟。第二种可能是希腊等国家退出后，欧元区可能变成一个小一点的，但是更好一点的货币基金组织。最坏的可能性是，大家在政策一致性方面很难达成共识，希腊退出后，其他大一点的经济体也退出，欧元区越来越小，甚至崩溃。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欧债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欧债危机如果持续发展，欧洲的实体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现在它的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衰退了。如果再继续发展，对经济体造成的冲击越来越大，可能会连续多年低迷、负增长。而欧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国，他们经济低迷，会减少我们的出口量，影响我们的市场，进而影响我们的增长，就业。另一个是来自货币层面。如果欧元持续动荡或者进入贬值，我们会有一定损失，因为我们外汇储备中相当一部分是以欧元形式存在的。欧元贬值，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记者：美国经济数据也非常不理想。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呢？

张礼卿：我觉得如果欧元区的经济持续低迷，美国有可能推出QE3。因为欧洲也是美国的重要市场。欧洲有经济危机，也会连累美国。但是目前来看，我们会感觉到美国经济在越来越多地调整，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这个也是不确定的。

如果外在环境恶化，危机面前，我们最重要的是应该加快我们的结构调整，更多地依靠内需而不是依靠外需来拉动。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投资方面，应该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这样才能在外需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消费的增长需要更多的改革，像社保体系的建立，教育、住房体制的改革等等，使得老百姓降低防御性的储蓄需求，这样才能使得消费增长较快。但在这些改革取得成效之前，中国的消费很难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是依靠市场主导来完成货币国际化，而在当今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政府主导。那您觉得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吗？市场与政府应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张礼卿: 我觉得, 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 基本上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政府的推动更多地体现在创造一些基础性条件上, 比如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保持本币的稳定甚至稳中趋升, 创造较为宽松的资本流入流出环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松资本管制。还有就是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 创造更多可供选择的、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 也许在有管理的前提下, 允许外国人持有和购买。

记者: 最后我们有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您能不能设想一下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张礼卿: 今后十年, 中国应该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 在世界上的地位肯定比现在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就像今天上午龙永图先生讲的, 中国应该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十年后, 人民币会有更大的接受程度, 但我认为还不会是最重要的货币,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美元、欧元。可以肯定的是, 人民币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重要。

走近“智慧城市”建设

记者：丘美芳



张维华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总经理

「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有创意的人才，在各行各业开展信息技术与本行业的深度融合，通过信息化这个倍增器，实现产业升级、效率提升。」

记者：上海“智慧城市”是市民消费得起的“智慧城市”吗？

张维华：从面向公众的光网套餐来看，上海电信推出的 20M 城市光网业务，折合每兆每月单价仅 9 元，属于全球范围内比较低的资费，对比国内北京、南京、杭州等八大城市也属于比较低的水平。

通信行业里面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融合，融合就是它是不是有能力把它所有的业务融合在一起，最终提供“一揽子”的服务。上海电信现在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并以“优惠”的价格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相信市民们也不希望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享受低廉需求的服务。我们现在用自行车的价格在骑摩托车，但我们不能要求用自行车的价格去开通用的轿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光纤入户后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按规划，上海大中小学“十二五”期间实现 Wifi 全覆盖。这些意味着上海电信需要与更多的组织如房地产商、学校、医院、汽车厂商合作，而以往上海电信更多的是独立经营；对此管理的策略上会做出哪些改变？您希望市委、市政府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维华：上海电信的管理理念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老电信的时候，我们有垄断思维、封闭心理，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干。但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大开放性了。比如接入网部分，市里边成立了第三方公司。实际上就是为了共建共享。光纤入户时，小区对各个运营商都会给予开放。也就是先建好光纤，至于这个光纤用联通、移动还是电信的，用户有选择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资源和应用这一段我们也进行了开放。我们成立了城市光网联盟，把视频多家组合起来形成联盟，为业务提供服务。而不是只有电信自己做的 IPTV。其实 IPTV 也是我们一个开放的合作模式和同盟。在很多地方，电信和同行可能谈不起来。但是在上海，最早从 06 年开始，上海电信就和文广进行合作，最早提供 IPTV。我们现在进一步地，不仅和文广，而且与土豆、盛大等这些有视频内容的单位形成合作，把大家都做起来。在业务的“源”里面我们也是实行开放的。

所以无论从“接入”还是“源”，我们在两端都已经实施了开放，这个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也是我们产业当中希望看到的结果，多样化和进一步地提升产业的活跃度。

我们希望市委、市府相关部门继续鼓励上海的企事业单位加大信息化实施力度，也支持上海电信为这些企事业单位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

记者：对未来十年上海“智慧城市”的建设，您有什么展望？

张维华：我们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有创意的人才，在各行各业开展信息技术与本行业的深度融合，通过信息化这个倍增器，实现产业升级、效率提升。因此，我们需要培养既了解本行业情况，又掌握信息化技术的交叉型人才。在这方面，上海电信愿意提供平台，帮助开展人才培养。

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应当尽快形成一批样板，以便推动各领域的复制普及。上海电信愿意会同相关行业，一起合作，树立样板。

通过上海电信与各行业合作，我们期望在十年之内，各行各业的内部办公、产业链协同、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环节，都能够普及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当然，每家每户也依托宽带网络、无线网络，普及实现在线购物、在线学习、在线诊疗、在线娱乐。这样的话，上海将可称得上是一座真正的智慧城市。

记者：上海是国内宽带普及率最高、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上海通信管理局 6 月即将出台“一揽子”宽带速度普及方案，政策将向弱势运营商倾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上海电信又将如何应对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

张维华：首先要看到，各运营商为智慧城市做贡献的目标是一致的，上海电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的主力军，其它运营商各有特长，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一些运营商由于其上级给予较重的指标压力，而发生一些不理智的无序竞争行为，是不利于创建一个智慧城市和谐建设环境的，通管局和经信委等行业主管部门开始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加大力度协调处理竞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记者：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编制了转型上海电信《转型实施纲要》，提出了率先在集团内首先实现转型这样一个中长期目标，明确在网络、业务、服务管理上转型的具体指导工程。这则纲要实施到现在，成效如何，今后的挑战又是什么？

张维华：2005年，上海电信积极接应集团战略目标，发布上海电信转型实施纲要，提出实现从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向现代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从实施成效上来看，近年来上海公司在中国电信集团内转型评估和考核排名中一直保持领先，基本实现了转型目标。

2011年，中国电信集团提出“新三者”发展目标，即是成为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内容和应用的参与者。智能管道具有高带宽、固移网络融合、用户可自主参与网络的配置与管理、以用户和业务分级按需保障等特点。综合平台是面向全业务、服务全客户、承载全功能、集成多能力的高度融合的业务承载和能力开放平台。内容应用参与则是聚焦发展自营汇聚型内容、应用以及支付和定位等能力型产品，并致力于创新体制和机制，培育未来收入的增长点。这一深化转型目标的实现也是我们今后面临的挑战。

新能源研究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记者：韩沁珂



赵国通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前上海市政府参事、前上海能源研究会副会长

「新能源的研究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要严谨、慎重的慢慢来，所谓的“弯道超车”是不科学的，急进的推进某个新事物必然会造成一些理论上不可能都预见到的事故。」

记者：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可能的新能源选择是什么？

赵国通：水能、核能是现在就已经在开发了，而且未来发展潜力大，中国目前只占 1% 的小份额，韩国占 13%，法国占 77%。另外不能因为日本的核泄漏事故就否定核能，他们用是早期二代核电技术，海啸造成柴油发动机停运，冷却水无法供应，才导致反应堆过热发生的爆炸。我们现在正在浙江建设中所采用的是第三代核电，台州专门为了核电站在山上建了一个配套水库，万一电力出了问题，就直接利用重力势能放水对核反应堆进行冷却，这叫“无动力安全系统”，是很安全的。还有两种新能源是我认为是目前十年比较可行的，一个是美国近年来开发很成功的页岩气，我国也有很多储量；还有一个深海石油，1500 米以下的深海石油，中国 5 月 8 号在近香港的南海建造了一个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这套装备就是上海研究并生产出来的。

记者：您在报告中提到人们对于新能源汽车存在很大误解，那在您看来都有哪些误解呢？

赵国通：第一个误区是新能源车就单指是电动车，新能源汽车还有甲醇燃料、乙醇燃

料车等等。第二个误区是电动车就单指蓄电池的纯电动车，其实还有燃料电池车、混合动力车还有高压电容电动车。电动车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对于新能源车的研究一定要百花齐放。搞科研应该鼓励，但产业化应该谨慎，一定要经济上可行的研究，光靠政府补贴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现在人们对于新能源的主观感觉太好了，很多人认为氢可以代替石油，海洋里有氢可以近乎无限量的提取，这是误解。现在用电能电解水提取氢，要付出三倍的能源代价。所以“氢”不是“人类的一次能源”，是代替不了石油。当然 50 年后等可控热核聚变成熟了，我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人工合成获得各种液体气体燃料，包括二氧化碳回收成为燃料，包括氢，那时候氢才是可行的清洁能源。不过它特别易燃易爆，使用时安全要求特别严格。所以我从来不同意将“氢”算作是什么“新能源”，只能叫做“新燃料”。

记者：抛开技术和配套措施的问题，现在人们对于电动车本身是否真的清洁也有很大争议，那在您看来电动车清洁吗？

赵国通：这不能一概而论，电动汽车不一定都清洁。要从全生命周期来考虑这个问题，上海用煤发电，电动车耗电就等于耗煤，不够清洁。但是像三峡地区用水流发出来的清洁电，电动车也就可以算是清洁的了。而且现在电动汽车价格较一般汽车高，为了鼓励购买，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会给补贴，这个补贴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单是就上海来说，每 1 万元 GDP 产值都要耗费 0.75 吨标煤，将政府补贴 3 万元就是 2.25 吨标煤已经烧掉了，用污染买清洁，这笔帐怎么算都不划算。更糟糕的是电动车的电池 2、3 年就不行了，要换就又要花钱，还要处理废旧电池，又要造成一次浪费或污染。

记者：最近新能源电动车出了几起事故，您怎么看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呢？

赵国通：新能源的研究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要严谨、慎重的慢慢来，所谓的“弯道超车”是不科学的，急进的推进某个新事物必然会造成一些理论上不可能都预见到的事故。电动轿车只是一个选择，但在 10 年内大范围推广是绝对不现实的！现在说的人家买的大部分都是混合动力车，它只能算是“节能车”。纯电动轿车极少有人响应。消费者们都不傻，就算有环保意识也不会主动给自己花钱找麻烦。

记者：那电动车在近几年内就一点市场都没有吗？

赵国通：我看在大城市基本没有，不是因为缺少充电桩，也不是价格高。纯电动车本身有三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一公斤汽油的所含的能量是一公斤铅酸电池的 100 倍，（锂电

池 50 倍)；第二：充汽油的时间是充电的 1/100，快速充电极其伤电池寿命不长；第三、内燃机旧了只要换易耗零件就好，但是电池旧了就要完全换新的，折旧费差 10 倍以上。但是电动车对于一些小的二三线城市倒是比较适合的，小城市行程半径比较小，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电动车。我带复旦大学研究生去年去到山东聊城时风集团考察的时候看到，在聊城低速小电动车就很好销，售价两万八千元一台，最高时速不超过 60 公里，铅电池有偿回收并专业无害化处理，那就很安全，环保。

记者：如果不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那么面对石油价格持续走高，供应紧张，我们该怎么办呢？

赵国通：石油危机直接引发的首先是“料源危机”，化学建材、农药、化肥、农用薄膜、化纤和高分子塑料等等现代人们生活必需的东西都是石油产业链上重要的产品。人类的历史就是材料的历史。人类能源利用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材料的变化上，从石器--木材--陶器--青铜器--铁器--塑料，这些材料所耗费的能量强度是逐步增高的。我认为要大力研究将来 50-100 年石油渐渐开采枯竭时用什么新材料来替代。

记者：您一直提倡两轮车，但好像这并不是一种很主流的观点，那您怎么看两轮车的推广困境呢？

赵国通：中国经济大跃进后人们向往买四轮轿车是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交通文化影响太大，觉得美国什么都好。其实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才 3 亿人，地广人稀，他们生活方式必须人人轿车，而且追求居住环境，要独栋别墅还加私家花园。美国模式不是我们学的，我把他们归为“别墅私园，人人轿车的高碳耗能的大康模式”，而我们国情和他们相反，我们人多，所以要“高楼公园，8 轮 +2 轮（轨交加自行车）式低碳环保的小康模式”。现在，美国人也开始反省他们的“汽车社会”模式为人类带了一个并不光明的未来。最近我看到他们一本新书《20 亿辆汽车》，就是一个很负责的忧虑。至于欧洲也是“人多地少”，他们早就呼吁少用汽车多骑自行车，9 月 22 日“无车日活动”就是他们首先开创的！遗憾的是中国响应的城市寥寥无几。

本世纪中叶有可能出现生态崩溃

记者：王 恺



赵章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调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先后任湖泊环境研究室和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兼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

「在我看来，在技术还没有过关的情况下，我们宁可降低速度，甚至停止开采都是可以的。与其这样盲目开采，还不如把资源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记者：近几年来，您一直在呼吁混合垃圾不要焚烧处理，那在您的设想中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合理而有效的呢？

赵章元：生活垃圾的话要走回收再利用的道路。我走过很多省和城市，发现企业的各种处理技术都是有的，基本可以做到垃圾循环利用，有不少企业目前已经可以消纳80%以上的垃圾，只是有些技术还不完善。当然也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政府如果可以加大力度扶植这些企业，那垃圾循环利用的未来还是很明朗的。我们要做的是把垃圾资源化融入到循环经济中去，这就需要调动社区垃圾源头分类和民营企业的处理积极性，强化多种垃圾资源化技术，建立不同层次的垃圾资源化产业园。

这在国外已经有先例了。日本原来是第一焚烧大国，但现在政府下令已经关掉了三分之二的焚烧炉，只剩下10%左右的垃圾因实在难以利用而焚烧。其他垃圾都被资源化企业利用了起来。

所谓循环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是，谁生产的产品，谁就应负责回收，将责任延伸，让企业不仅要和生产负责，同时也要负责回收再利用。

记者: 中国或者说上海的实行现状如何呢?

赵章元: 在这点上, 全国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有些地方只是喊喊垃圾分类口号, 或长期试点, 并没有真正去做。但另外一些地方却做出了样板来, 比如广州市组织了 14 个社区进行垃圾分类; 北京门头沟王平镇在垃圾分类处理后, 达到了零废弃, 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处理垃圾的问题上, 我们要以政府主导为主, 配以民众监督, 要让责任具体到社区, 具体到负责人, 然后到运输、处理, 要形成一套体系。

记者: 关于民众的力量, 您在论文中也提到过, 比如在垃圾循环处理方面, 只要政府真正去主导, 政策出台, 民众都会去做。您对民众的信心来源是什么呢?

赵章元: 我们不能忽视民众的力量, 在美国, 已有近 150 万个环保组织, 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 可以直接干预到很多事件的处理, 或是政策决定。而在中国, 现在也已经成立了很多环保组织, 并积极投入到各类环保事业中了。如在北京六里屯和阿苏卫事件中, 正是因为民众的呼声, 使得当地本来要建的焚烧炉至今也没有动工。如渤海湾漏油事件, 他们在事发后几天内就赶到了事发地, 敦促当地的负责人员处理, 也促使事件得以尽早曝光, 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

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他们对于在自己周围的环境问题, 同样也非常关注。比如在无锡, 当地政府曾经建造一座焚烧炉, 而它的周围本来就有一个别墅群, 当地百姓得知后, 特地派代表到北京, 请民间环保组织帮忙, 他们还成立一个公众监督小组, 没有他们的批准, 焚烧炉便不能开工。并要求垃圾在分类后, 资源化处理。

可以说, 中国在发展, 国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也都在进步。虽然说民众对活动的参与度不同, 环保的意识和迫切度, 不同地方快慢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民众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环保事业中, 也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建立起来, 这表明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我对于中国公众参与还是很有信心的。

记者: 在您的报告中, 您提出希望要控制或者限制油田开采, 但能源缺少却是一个现实状况,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赵章元: 对于能源的需求其实很难说有一个满足的度, 而我们政府所需要做的, 是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和现在的环境容量, 来有计划地控制发展速度。我们控制发展速度并不是要将企业停工, 而是需要花时间来治理这些已经产生的污染并预防它再次发生, 这样发展速度也必然降了下来, 环境问题也能够得以改善。我们需要由政府来控制, 按计划来发展。不要

过度在意 GDP 的增长速度，不需要高到“百分之十几”，而有“百分之几”的增长速度也可以，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绿色 GDP。我还是主张：在我们实现温饱后，就极力控制发展速度，力争能够还稳稳当当地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宁愿我们发展得慢一些，但是人们的身体是健康的。

具体到渤海采油问题上，现在我们的采油技术和污染控制技术还不够成熟，大连油库刚刚爆炸不久，连应急措施都跟不上，还在采取发动当地民众去徒手捞油的愚蠢做法，现在又发生采油失误，竟然长达 3 个多月失控。所以，我坚决反对过快过多地开采渤海石油，并且在我看来，在技术还没有过关的情况下，我们宁可降低速度，甚至停止开采都是可以的。与其这样盲目开采，还不如把资源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记者：在污染方面，您在上海论坛的发言中，还有提到大气污染问题，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控制燃煤所带来的污染。在上海，已经推行家用燃烧天然气，您觉得这是否可以缓解污染问题呢？

赵章元：只能说是相对而言，烧天然气或煤气与烧煤虽然都能产生温室气体，但烧气体能充分燃烧，总比烧煤要好得多，燃煤中的 SO₂ 等污染物已成为当今地球上的一大祸害，既能形成酸雨，又是人类诸多慢性病的直接祸根。

在燃煤问题上，大型热电厂是污染大户，但小型的小火电问题更大。不仅是灰尘，还有二噁英，这是民众最反感的。国家虽然早已明令禁止了，但是现在，他们又换了一个包装：绿色能源，重新上岗。现在政府的监管还有待提高，环境意识落后于民众，这也是我们反对焚烧混合垃圾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呼吁敦促政府尽快解决。

记者：污染成灾也同样影响到了我们的食品安全，那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赵章元：有关这个问题可以说的内容太多了，从政府角度出发，对食品的把关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对土壤把关，农作物的生产基地都是有一定标准的，一旦土壤被污染了，政府就需要禁止当地生产；其次是对各类农作物把关；进而是食品制造出来后也需要由专业机关检测，要对各种添加剂严格把关。但现在，这些措施都跟不上。所以民众在无奈的情况下，也要采取必要的、适合自己的防范措施。如家里的饮用水可以用制水机过滤一下，空气可以用空气净化器净化。居住环境也要有所选择，购买食品时尽量避免选择添加剂过多的食物。

记者：您所提出的“北京、上海、东京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这一观点，具体怎么说？

赵章元：如果单从交通方便、文明程度等这些方面来看，这些地方也是宜居城市，而我所

说的不宜居，主要是从影响身体健康的环境类各因素出发的。如果身体健康都不能保障了，这里也就不能算是宜居城市了。东亚地区的大气污染是全球最严重地区，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尤其是北京，在环保部发布的空气质量调查中，已经排名中国倒数第三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让当地居民都搬走，我只是提出意见，引起大家关注，希望政府能够尽快采取措施，搞循环经济，抵制污染。而这也是需要全民共同努力的。

记者：最后，请您畅想一下十年后的中国吧！

赵章元：这很难说，主要还是要看政府是怎样控制的。如果按现状发展下去，未来的中国是很危险的。首先人体的健康就难以保证。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新发癌症患者最多的国家，发病率直线上升，糖尿病、血管病病人也大幅增加。并且，这样的发病趋势有年轻化、婴儿化的特征，出生缺陷也成为了婴儿死亡、儿童和成人残疾的重要原因。最危险的一点是现在中国已经出现生育能力急剧下降的趋势，男性出现了“精子危机”，女性出现“胎停育”。在十年后的中国，这个问题会比现在更突出。本世纪中叶有可能出现生态崩溃。如果不加以防治的话，到时，生育困难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发展。所谓的人类灭绝也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各国科学家其实也都意识到，如果环境继续遭受污染，不久的将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可能真的会到来。

对环境问题的关心要上升到全民的高度

记者：邹 烨



周启星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生态学会污染生态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十年后，我国在生态环境建设各方面还在不断地加强重视，各种环境的标准政策法规还在不断完善当中，所以我想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做我们想做的事。」

记者：有学者认为从纵向发展来看，我国的生态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您说过“国内环境基准研究非常落后 从根本认识上存在错误”，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国内的环境基准研究。

周启星：我们这个环境标准分成三块，一个是水的环境标准，一个是大气的环境标准，还有一个是土壤的环境标准。我们国家对水的环境标准比较重视，十一五投入了好几十个亿来开展水专项，但土壤环境标准是比较落后的，比如美国土壤环境标准有两大体系，第一大体系就是质量标准，第二大体系就是污染土壤的修复标准。而中国只有一个质量标准，1995年颁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到现在还没有进行修订，非常不完善。

记者：您说过，我们国家环境管理中，环境标准、法规的制定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对于“关键的时期”您是如何理解的？现在许多污染问题的出现与环境方面法律的不完善有多大联系，我们又怎样度过这个时期？

周启星：我们的环境标准和法规正在逐渐完善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太急，

不要不严肃，应该深入研究争论，好好探索，有了好的标准，大家都认可，再加上好的执行过程，我们的环境问题就会解决得越来越好。现在许多污染问题的出现与环境方面法律的不完善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人们就会对可行度产生怀疑，从而规避执行环境保护的措施。此外，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要对老百姓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宣传。

记者：现在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污染不再止于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而国际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涉及到许多因素的牵扯，您认为有什么好的措施？

周启星：环境问题往往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例如之前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松花江的下游是俄罗斯还有日本，上游的污染下游当然很关心，还有大气污染从东半球飘到西半球，涉及的范围很广，例如早期英国工业产生二氧化硫，飘到天空，形成酸雨降到瑞典，所以瑞典反对英国要烧含硫的煤。中国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我们周围有日本还有俄罗斯，在南边有越南和菲律宾，他们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上海也一样，这几年发展很快，但环境问题也非常突出，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上海本身，还有毗邻的江苏浙江周围地区，还有公海，所以世界各国都比较关注。

解决国际性污染问题要靠各方面的沟通，我个人认为要采取积极的方式来解决：一要采用各国的政策支持；二也要靠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治理的效率，并通过环保部门等机构把这些技术运用到治理中；三要加强国际合作，可以采纳一些别国的好的做法。

对环境问题的关心要上升到全民的高度，这样环境问题就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现在很多环境问题，很多人第一他不知情，第二他知识有限，第三他环境意识还没提高到那么高的水平，所以影响了责任的承担。

记者：您说过“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节能环保间的关系”，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要如何面对这一问题？

周启星：因为上海一直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发展需要足够的能源供应，所以能源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要解决能源问题，首先要节能，其次要减低碳的消耗。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并不是个容易的问题，需要政策、技术一起来解决，技术问题相对简单，但一旦涉及到政策和利益问题，好的技术就推不容易推广下去。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要如何面对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出现的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土地问题，特别是城乡之间土地资源的协调问题，在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的同时要如何兼顾

绿色城市化？

周启星：因为城市化是把人口再集中，在集中过程中原来的生态系统肯定会破坏，表面上看两者是一个矛盾体，实际上如果我们如果实现有所规划和运用，城市建设和绿色城市也可以同时发展。在英国的伦敦集中了全国人口的 30%，伦敦就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而腾出了人口少的地区就可以进行环境保护。如果上海在建设中注意绿化，注意生态系统的保护，更好地做好规划的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绿色与发展兼得的。当然，前提是城市的规划和政策要做到长期系统性，尤其要重视生态规划。

记者：2009-2011 年，闵行区先后荣获“联合国环境友好型城市示范项目”、“世界屋顶绿化最佳城市金奖”等称号，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绿色项目都是在一些开发较少的地区做试点，那么在一些已经污染较重或是像上海的中心城区该如何发展绿色城市化？

周启星：不要把绿色项目搞成形式，中心城市和老工业区要根据它们各自的特色来搞城市建设，不能千篇一律，不同的情况要不同对待，否则花了很多钱也最终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做好生态规划，而且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生态情况、污染情况来做规划。

记者：如果要把“绿色城市化”作为一种理念向大众推广，让绿色城市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启星：这还是国际道义和环境意识的提高问题。

环境意识的提高有几个方面，政府要很好地引导，知名学者和企业家也要发挥作用，单纯靠百姓自己很难提高深层次的认识。环境保护的宣传要从各个途径来进行，例如电视要通过公益广告或其他方式向公众宣传生态对子孙后代对当代人民的重要性，以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记者：您对上海绿色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建议？

周启星：我在英国待的时间比较长，英国的工业革命城市发展比较早，伦敦一开始污染也很严重，后来开始注意环境保护，现在生态环保做得很好，上海可以学习伦敦的经验。上海工业发展在中国也是最早的，上海和伦敦在环境治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第一个建议学习伦敦，美国芝加哥以往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经验中的积极的部分。

关于具体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加强全民环境意识，第二在技术层面上加强科学研究，尽快把技术进行应用。

记者：现在有一部分人觉得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几乎无可挽回，也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您是如何看待的？

周启星：我认为是一个阶段，并且要积极对待。任何一个社会过程的出现都是有道理的，西方六七十年代，污染非常严重，后来经济承受力好了，就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比如德国的莱茵河也曾经污染得很厉害，说明只要我们重视，只要我们积极面对，尤其要注意保护，不是它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恢复还是比较容易的。

记者：您认为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的？

周启星：十年在人的一生尤其在历史当中不算长，很快就过去了，十年前发生的事就好像最近才发生一样，我还能回想起来，所以十年很快就会过去。十年后，我国在生态环境建设各方面还在不断地加强重视，各种环境的标准政策法规还在不断完善当中，所以我想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做我们想做的事，不会像现在污染问题这么突出，环境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尤其是一些污染的土壤水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治理，我对我们环境生态问题的解决还是有信心的。

人民币国际化走的是“创新模式”

记者：龚瀛琦



朱民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52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后赴美留学，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民还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董事、普林斯顿大学校董、复旦大学荣誉校董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全球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是否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不是总体GDP，而是人均GDP、科技、文化、人的素养、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既不要低估GDP的作用，也不要高估GDP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占全球GDP半壁江山

记者：现在欧债危机有深化趋势，此前关于希腊“脱欧”的传言很多，希腊大选后的结果似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你此前是怎么看的？

朱民：第一因为政府选举，第二个因为希腊存款正在流失，所以大家比较担忧。我们认为，希腊还是应该留在欧元区，相信他们也会留在欧元区。目前来看，欧洲各个国家领导人，包括希腊民众也是这样希望的。不然对希腊本国、欧元区、全世界影响都很大。当然，我们尊重希腊政府和人民的决定，也会对各种情况做预测分析和准备。新政府上台，对于后续的政策，我们也会进一步讨论。我们的责任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并且对此很有信心。

记者：你如何看待欧元区的未来？

朱民：欧元危机的根源在于，有一个货币联盟，却没有一个财政联盟，所以使得它的货币运行比较困难。但我们依然要看到，整个欧元区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财政水平也不是最糟糕的，甚至它的债务水平比美国和日本还要好，消费水平也很高。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话，其实整体水平还可以。但问题是，欧盟不是国家，只是货币联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央行和财政，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欧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储备货币，不会受短期汇率变化的影响。

记者：今年全球经济是否会因此放慢增长？

朱民：全球经济今年应会整体放慢，我们估计增长率会在 3.2% 左右，比 2011 年的 4% 慢不少。第一季度开始，经济有所缓和，美国走势比较强，欧洲略有反弹，但是最近波动进一步加大，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看来也在放缓。下行风险从现在来看是增加的。另外，虽然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在减速，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比如说，今年预计全球增长率为 3.2%，发达国家 1.5%，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有 5.5%，相差 4 个百分点。去年全球经济增长 4%，发达国家 2.2%，新兴市场国家有 6.2%，也是 4 个百分点。差距一直存在，而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速度一般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两三倍。我们预测今年是很关键的一年。用可比较价格来衡量的话，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达到全球 GDP 总量的 50%，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

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

记者：中国是不是应该加强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管理？

朱民：怎么来管理资本流动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未来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前面提到新兴市场国家 GDP 占到全球 50%，但是金融财产只占 19%。资金流入当然是好事，帮助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发展、金融市场改革，但如果反复波动的话，冲击也会很大。我们发现能够抵御波动的，只有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金融改革加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制度建设，只有一个好的金融市场才能吸收和消化更多的资金。另外，如果资本流动太大影响到了宏观经济，我们也鼓励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措施，这得到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赞赏。而这个前提不是对市场的干预，不能通过汇率的波动来判断，而要看是否影响到了宏观经济，再采取行动。汇率肯定还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汇率不能吸收（影响）的情况下，再采取其他的措施。

记者：再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

朱民：人民币汇率关键点不在于水平，而在于机制，要更多地放到市场调节的机制上。以后会朝这个方向走。金融最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资源配置有效。这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的过程，各个方面的过程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传统理论认为，应该先完成资本账户开放、货币可兑换，然后再国际化，但是现在看来也未必完全对。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规模、人均 GDP 很低、甚至金融体系不完整的一个经济体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中国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式。人民币走了一条很聪明的路，贸易结算的人民币化程度，现在已经达到 10%，走得非常快了。

同时，大家也很关注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储备货币。其实这既重要也不重要，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看德国，马克国际化走了 50 年，一直是管理和浮动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一直把汇率波动和国际化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企业改革连在一起，所以这 50 年来它汇率不断升级，竞争力也不断提高。日本的汇率改革在广场协议以后经历了较大波动，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泡沫。中国渐进地走人民币利率改革，同时推进国际化的过程，是我们的创新模式，一定会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

另外，关于人民币结算问题，重要的不是储备货币，而是储备产品。如何让人们持有人民币呢？必须投在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上。所以，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过程中，开放投资渠道，然后加强监管，扩大流动性，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自然就国际化了。

记者：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能出现利率市场化？

朱民：利率市场化不仅仅是放开的过程，还是一个市场竞争、透明度、监管、治理机制的问题。利率放开只有在金融机构本身已经独立自主以后，朝着市场化方向才可以完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加强资本机制、商业化运作、改变股权、国际资本介入等，都很重要。要逐渐使银行行为市场化、企业行为市场化，这样的环境下利率才能起作用。

中国硬着陆风险不大

记者：中国把稳定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有人担忧是否会加大硬着陆的风险？

朱民：我们认为还是会软着陆，硬着陆风险不大。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之前的刺激经济政策，反弹很强，但主要是靠投资拉动和贷款支持，这是再杠杆化

的过程，10 年的投资比重占到 48.7%，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关键在于在降速的时候要调整结构，比如放开服务业、增加就业、缩小收入差距、拉动内需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要解决。要从贸易拉动走向投资拉动，然后现在还要靠内需。更主要一点，想让老百姓消费，先要让老百姓有钱。先开放服务业，再加强创新。税收要走向一个更广的税基，这些都是改革的过程。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很有信心，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还是能够维持在 8% 左右。

记者：有研究认为 2030 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 10 年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

朱民：中国是否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国家实力的不是总体 GDP，而是人均 GDP、科技、文化、人的素养、制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既不要低估 GDP 的作用，也不要高估 GDP 的作用。

从法的角度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思考

记者：严一心



朱淑娣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福克斯国际学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理事，上海市人大及市府行政法咨询与评审专家。

「“民告官”是可能推进行政法治的，这也包括环境行政法治，并有助于行政机关更好地公开环境信息，从而使法律得到实施，相关人利益也得到保护。」

记者：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这方面的国际公约、协定等具有怎样的特点？

朱淑娣：作为国际环境协议，它和国际贸易协议比较来看有很大不同。国际环境协议追求的是国际公共利益，国际贸易协议在遵循国际规则基础之上追求各成员方自己的利益，这是最大的区别。比如WTO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规定，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某个行为可能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如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然后认定构成倾销/构成补贴，对其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损害威胁，并且倾销/补贴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要增收关税。各条约参与方对自身的私利考虑得较多。国际环境公约是条约参与方共同追求全球环境的改善，并不受国别的限制。这可能需要国家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是经济的代价，也可能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美国或许不太愿意实施有利于全球环境的国际条约，如布什政府于2001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其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3.2%。2011年12月，加拿大也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记者：您刚刚提到，在协调共同利益的过程中会涉及各国的包括经济在内的利益？

朱淑娣: 是的, 环境问题是個非常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我们只能从法的角度, 尤其是从行政法学的角度, 从第一步做起来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从而增强此领域的公众参与, 约束行政主体的权力, 尽可能通过多重机制来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利。

记者: 是否需要 NGO 组织或国际监督来保证、促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朱淑娣: 确实需要社会公众特别是舆论压力来采取集体性行动。有些国家或地区已经发展出 ENGO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专门的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目前有国际组织, 也有相当多的国际条约; 但是除了 WTO 这样的国际组织, 它的司法审查具有强制约束力以外, 其他大量国际组织制定的条约没有特别强制的约束力, 相当于软法, 不是很强硬。环境问题上, WTO 也没有达成协议, 估计可能和主导方特别是美国有关, 他们是制造环境问题的大国。国际上, 双边、多边还有国际组织的协议、热心公益的人士也在推进, 有国际约束应该会好一些。

记者: 国际公约很多是软法, 不具有约束力, 那么您认为国内的法律在约束力和可操作性上如何?

朱淑娣: 国内有一个层级结构, 依次是宪法、人大或人大常委制定的狭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我国的金字塔结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法律体系, 总体评价基本体系已经构建完成, 但还是存在问题的。我的研究报告中提出, 从立法角度, 基本问题应符合良法的一般标准及基本原则, 即在内容上反映客观规律、形式上具有科学性、价值上考虑公平性, 在此基础上, 再通过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统一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规章, 这样规范化程度会很高, 比目前的办法更为全面更好一点。人大的立法是框架性立法, 可操作性相对弱一些。

在论坛总结时, 我提出针对中国环境建设, 到底是运用国际化资源还是本土化资源, 环境与法律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谈了自己的观点, 以开放的眼光来看, 环境文明生态文明问题很复杂, 法治是其重要的制度保障, 其资源应会通中西, 比如外国环境测评等比较先进的评估机制应该学习, 我国古代也有大量如何处理人和环境关系的智慧, 国际化和本土化应该兼顾; 另外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法治对于环境建设, 意义至关重要, 环境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 更牵扯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 有一个利益配置问题。在环境领域中, 公众参与作为社会监督力量、作为法治推进者, 要对利益进行配置, 要对权力进行控制, 要确保公众参与, 必须要有法律制度保障。

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域内都有约束力。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相

对于人大制定的法律来说，可操作性更强一些。

记者：那么您是否支持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民告官推进了法治完善”这个说法？

朱淑娣：“民告官”是个通俗的表达，正式来说是“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从最直接意义上来看是解决争端，从间接角度来看能使得原先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领域中制定的法律得到切实的实施。如果行政机关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当事人认为不行，就要有一个居中裁断者——最权威的司法检查主体，即法院。他们依据司法审查权，对环境领域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民告官”是可能推进行政法治的，这也包括环境行政法治，并有助于行政机关更好地公开环境信息，从而使法律得到实施，相关人利益也得到保护。

记者：在民告官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这一点上，您认为民和官是合作的关系还是博弈的关系？

朱淑娣：两方面都有。一般民间的个人、企业、组织在行政管理中间处于不对等的弱势方。比如，环保局所作出行政行为，仅仅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很难避免官官相护、行政的自我保护。个人或单位到法院去寻求司法居中裁断的方式，来谋求司法保护和救济，官和民之间就可以取得平等的地位，法院是主导方，这当然有一重博弈的关系。

但是法官代表法院判决，无论判原告“民”胜还是判被告“官”胜，都是要依据法律的。通过判决，把有关特定领域比如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真正有效实施，原告和被告也在共同接受法制教育，更多的时候是被告胜诉原告败诉，就表明被告的行政行为是有正当性的，个人单位尤其是经济型组织的原告也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有破坏环境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此时由法官主持，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民和官之间会形成行政合作的关系。有些地方还开放出行政协议，如某环保局和某企业签订协议，如果企业在一年之内减排一定额度或遵守国家的环保法律，环保局可以给它评奖、给予行政奖励等。通过诉讼推进民和官的协作关系，其原因在于首先法官让他们明白在环境管理法律关系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接下来再为他们确立进行合作的前提。

记者：您刚刚说公开过程中可能有官官相护，这是否就是限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因素？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朱淑娣：从公民自身角度来看，公民环境知情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很多人不知道环境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制度，也不知道自己有权利要求环保部门公开相关信息。因为我国

发展的不均衡性，法文化普及度尚显不足。第二，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基础不够，很多人缺乏这种公益精神，减弱了对环保部门公开信息的监督力度。要有强烈的意识，通过媒体包括自媒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可能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第三，从政府自身来看，由于受到保密传统影响，有“能不公开就不公开”的想法。法律只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里面有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受到保密传统的影响，认为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尽量缩小公开范围，也限制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

另外，司法审查机制还不够完善。虽然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后有所进步，但是我们国家包括环境行政诉讼在内的司法审查机制，在审查范围上还存在比较狭窄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多成熟法治国家法院会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我国规定抽象行政行为法院无权审查，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显然，从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来看过于狭窄，往往大量违法侵权行为是因为“红头文件”本身不合上位法，而造成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目前把这个审查权交给了上级审查机关人大，而没有交给法院。法院有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应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保障，所以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狭小也是限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一个障碍。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55664590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